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Volume 7, Number 2, October 2020

第7辑，第2期，2020年10月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社长
饶兆斌

主编
潘碧丝

副主编
贺艳青 林德顺

编辑
李冉 刘玉玲

英文编辑
陈淑怡 张添财

编辑助理
陈矜孜 江俏陵 韦丁华
张发辉 张彦涵 周锦聪

国际编辑委员会
(排名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海光
华东师范大学

庄国土
厦门大学

吴小安
北京大学

周建设
首都师范大学

崔之元
清华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李锦兴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杨雪冬
清华大学

袁兴言
金门大学

黄子坚
马来亚大学

江柏炜
台湾师范大学

沈志华
华东师范大学

单宝顺
浙江理工大学

聂珍钊
华中师范大学

潘小慧
辅仁大学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airman

Ngeow Chow Bing

Chief Editor

Fan Pik Shy

Deputy Chief Editors

He Yanqing Ling Tek Soon

Editors

Li Ran Lau Yoke Lian

English Editors

Chan Sok Gee Peter Chang Thiam Chai

Editorial Assistants

Tan Kim Kee Kong Siew Lin
Wei Dinghua Chong Fatt Way
Chong Sin Wah Chew Chin Chong

International Editorial Board

Bo-Wei Chiang <i>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i>	Chih-Yu Shih <i>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i>
Cui Zhiyuan <i>Tsinghua University</i>	Danny Wong Tze Ken <i>University of Malaya</i>
Lee Kam Hing <i>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i>	Nie Zhenzhao <i>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Pan Hsiao-Huei <i>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i>	Shan Baoshun <i>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i>
Shen Zhihua <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Shing-Yen Yuan <i>National Quemoy University</i>
Wang Haiguang <i>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i>	Wu Xiao'an <i>Peking University</i>
Yang Xuedong <i>Tsinghua University</i>	Zhuang Guotu <i>Xiamen University</i>
Zhou Jianshe <i>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i>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Volume 7, Number 2, October 2020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第7辑, 第2期, 2020年10月

©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in 2014

COPYRIGHT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copi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otherwise,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Under the Copyright Act 1987, any person who does any unauthorized act in relation to this publication shall be liable to prosecution and claims for damages.

The contents of a published article in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reflect the view of the author or authors and not that of the editors of the journal or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Cover Title: Dr. Lee Kean Yau

Typesetting: Wong Yee Chen

Printed by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University of Malaya, Lembah Pantai,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Please visit the CCS homepage at

<https://icsum.org.my/contemporary-china-studies-ccs/>

The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s an academic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Malaysia, focusing on related issues about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contemporary China.

Manuscripts for consideration and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sent to:

Editor,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Tel : +(603) 79567288

Fax: +(603) 79674438

E-mail: ccs2014ics@gmail.com, chinastudies@um.edu.my

Further editorial communication and acquisition, subscription and other enquiries could also be sent to: Miss Susie Ling, CCS Editorial Manager (E-mail: susielyp@um.edu.my)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ontents 目录

- 《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的“相结合” 001
——以文本传播为视角 / 王海光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Mao Zedong's "Combin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Communication / Wang Haiguang
- 中国瑶学研究七十年 / 玉时阶、玉璐 025
Seventy Years of Yao Studies in China / Yu Shijie, Yu Lu
- 论《华盛顿邮报》对 2016 年初中国股市风暴的 041
报道 / 李银波
On *The Washington Post's* Report on China's Stock-market Storm
at the Beginning of 2016 / Li Yinbo
- 汉语母语者对双字名词的非线性识别 / 丁彧藻 061
Non-linear Recognition of Two-character Nouns by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 Ding Yuzao

Contents 目录

【书评】

华南宗乡文化在海外 081

——曾玲《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书评 / 廖文辉

The Southern China Clan Culture Outside the Mainland:
A Book Review on Zeng Ling's "A Study of Chinese Clan
Culture in Singapore" / Lew Bon Hoi

人类赢了吗? ——马凯硕《中国赢了吗?》书评 / 林德顺 085

Did Humankind Win the battle? A Book Review on
Kishore Mahbubani's "Has China Won?" / Ling Tek Soon

《共产党宣言》与毛泽东的“相结合” ——以文本传播为视角

王海光

摘要：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厘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

关键词：《共产党宣言》；毛泽东；文本传播；新民主主义

作者：王海光，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客座教授，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当代史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主要著作有：《旋转的历史》（1995年出版）；《从革命到改革》（2000年出版）；《林彪事件》（2012年出版）。邮箱：wanghaiguang@sina.com

Title: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nd Mao Zedong's "Combin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xt Communication

Abstract: Base on the text communication of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in China,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cess involved in the spreading and adapting, of the various transformation of Marxism Leninism in China. A process also known as "combining" Marxism Leninism theory with Mao Zedong's local culture and wisdom, and of "combining" the Communist world revolution with Chinese social radical revolution. This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Marxist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China, progressing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Keywords: Communist Manifesto; Mao Zedong; text communication; new democracy

Author: Wang Haiguang, is a retired history Professor at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He currently holds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ofessor Wang'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is main publications include: *The Rotation of the History* (published in 1995), *From Revolution to Reform* (published in 2000) and *The Lin Biao Event* (published in 2012). Email: wanghaiguang@sina.com

20 世纪初年，中国正处于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新旧交替时期，社会道德失序，政局动荡不安，人心扶摇不定。各派政治势力激烈角逐，各种西方思潮大量涌入，新旧文化激荡冲击，给积贫积弱的中国带来了激发活力的强烈刺激。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为意识形态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并迅速进入到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掀起了中国共产革命的暴风骤雨，把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巨变推到了最高潮。共产主义输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的“中国化”过程，即马克思的西方阶级斗争理论、列宁夺取政权的机变能力和中国社会激进的革命运动“相结合”的过程。马列主义革命向中国的输入和移植，有着不同国情的巨大落差，有着水土不服的变通性和南橘北枳的变异性问题，所以，“相结合”的“试错”过程曲折激烈，付出了极高的历史代价，最后才实现了列宁主义革命在中国的胜利。

研究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变通、变异和变形，离不开对马列主义经典文本的传播史研究。但是马列主义书籍浩如烟海，取其删繁就简之道，可以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经典文本进行传播史研究。在中共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体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著作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这几篇马列著作是中共中央规定的干部必读书，在全党反复学习，构建了中共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共产党宣言》讲的是阶级斗争问题，《国家与革命》讲的是阶级专政问题，《帝国主义

论》讲的是时代问题，《联共（布）党史》是斯大林主义的“百科全书”。

《共产党宣言》是在中国传播的马列主义经典文本中最为根本的一部。它既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革命道统，又是中共进行阶级斗争的一部革命圣经，在实现共产主义的价值目标上具有多重的时代性意义。从阶级斗争学说传播史的研究角度，《共产党宣言》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经典文本。

在中国能够领袖群伦实现这个“相结合”的，既不是领导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中共创始人陈独秀，也不是莫斯科一手培养起来的职业革命家，深得斯大林信任的王明等人，而是志向远大、博览杂书、意志坚定、性格强悍的一个湖南湘潭的农家子弟毛泽东。毛泽东的成功，客观上是历史机缘辐辏的结果，主观上是他与众不同的个人禀赋、知识结构和实践能力，使之对中国历史和社会民众有更深刻的了解，因而也更具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相结合”的能力。

毛泽东是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坚定信奉者，一生都在搞阶级斗争，临终前还讲“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但在学理层面上，马克思所讲的阶级斗争，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毛泽东所讲的阶级斗争，则是前现代化传统国家在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时期的阶层分化。两者具有着不同历史时代语境的巨大社会文明差异。所以，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与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在学理逻辑上多有不合之处，为国际派教条主义者讥讽为“山沟沟里的马列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应该说，国际派教条主义认为毛泽东的马列主义水平低下，视为“旁门左道”的讥讽，都是所言不虛的事情。毛泽东的马列主义与原教旨主义的马列主义原本不同，或者说是一种变了形的马列主义。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变形，是为适应中国土壤的中国化改造。事实上，如果没有“相结合”的中国化变异和变形，这个舶来品的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社会是难以立足的。这里需要有对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的知识经验，需要有了解底层社会情况的江湖阅历，更得有坚忍不拔的知行能力，否则是不能完成这一过程的。

本文以《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文本传播为研究视角，试图厘

清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变通、变形和变异过程，也就是马列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本土文化和智慧“相结合”的过程、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与中国社会激进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从而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发展，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逻辑。

一、《共产党宣言》传播与中国共产革命的积变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开宗立派，是以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为时代标志的。它认为：现代化大生产使社会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原有的社会关系已容纳不了社会生产力蓬勃发展的要求，断言：“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而新兴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工人阶级无祖国”。

《共产党宣言》向全世界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¹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党宣言》是一篇激情四溢的论辩文体的小册子，其真理在握的自信，文采激扬的文字，铿锵有力的逻辑，简单明确的结论，对青年人是极有魅惑力的，比较《资本论》，对中国人有更重大的影响。几乎所有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都宣称自己是读了《共产党宣言》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很少有人讲：自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徒，是读了《资本论》，洞悉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秘密，从而投身共产革命的。《资本论》这部号称“工人阶级圣经”煌煌大作，深奥难懂，艰深晦涩，不是一般人能涉足的。然而，比《资本论》更难让中国人读懂的，还是马克思所处的社会和时代。这位一生都在过流亡生活的犹太血统的德国人，在世界工业文明中心的英国伦敦创作了《资本论》，提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理论”学说。这个著书立说的历史场景，与前现代化的

1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4、307页。

传统农业国家的中国国情，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社会时代。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的矛盾，所谓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与前工业化的传统中国社会完全是不着边际的事情。还没有走出传统国家体制和传统农业社会的近代中国，轮番上演的就是白骨露於野的饥荒和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战乱。西方工业社会发生的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太奢侈的海外奇谈了。所以，要让他们穿越两种时空环境来读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实在是一件天方夜谭的不可思议之事了。在中共早期建党人物中，对《资本论》有过学理性系统研究的，可能是在日本留过学的李达了。这位中共创始人，毕生搞的是课堂上和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从事都是“书斋里的革命”，并没有搞过实际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活动。²如果不是他参与组党的中共革命成功，以其才具而言，可能终身就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教书匠而已。

毛泽东多次提到《共产党宣言》对他思想的重要影响。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县的山沟里，给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介绍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讲：他是在1920年读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由此而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³1941年9月，毛泽东又在延安回顾说：他是读了这三本小册子，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⁴他从中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成为了他一生的信仰和事业。

毛泽东给斯诺讲他阅读《共产党宣言》的时间，可能是有意识地给提前了。据研究者考证，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此时还尚未出版。⁵（罗章龙回忆，毛泽东读的是北大的油印本⁶）。但这

2 参见宋镜明：《李达传论》，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131页。

4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

5 【日】竹内实著：韩凤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第214-215页。

6 罗章龙在1990年3月曾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

正是表明毛泽东对《共产党宣言》的高度重视，奉之为阶级斗争的经典教科书。在他的有生之年，多次督令全党干部阅读该书，“弄通马克思主义”。⁷然而，毛泽东缺乏西方民主社会和大工业时代的知识背景，对《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着理解上的时代偏差。他最看重的是《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的“两个决裂”的思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毛泽东早年曾信奉“新民说”，革命志向就是要全面改造社会和全面改造人们思想观念，这与“两个决裂”在情怀上是一致的。然而，他毕生也没能理解《宣言》追求的人类社会价值理想目标——“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⁸但是，正因为这种知识局限性和时代错位，却给毛泽东提供了把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想象空间，给他解读和运用阶级斗争学说带来巨大的灵活性。这正是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一个关键问题。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如饥似渴地对西方学术的知识追求，对新潮的马克思学说也有了一点粗浅的知识。但无论是知识界最新潮的学问家梁启超，还是政治上最激进的革命家孙中山、朱执信等人，都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学说的一种，并没有予以特殊的厚爱，更没有把它作为救世良方。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当时中国社会仍然是前现代化阶段的传统农业经济体系，现代工业体系还只是萌生阶段，所谓产业工人不过是一群刚刚来到工厂

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

《共产党宣言》不长，全文翻译了，按照德文版翻译的，我们还自己誊写，油印，没有铅印稿，只是油印稿。我们酝酿翻译时间很长，毛主席第二次来北京后看到了。

7 1964年2月，毛泽东要求全党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30本书中，第1本书是《共产党宣言》。同时期，毛泽东阅读的马列经典著作还有，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70年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再次要求全党学马列。所列的6本马列著作中，第1本书也是《共产党宣言》。

8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6、293、294页。旧译文为“一个以各个人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见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91页。

打工谋生的农民，没有形成阶级意识，只有帮会气质。马克思所讲的西方工业社会两大阶级的斗争——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中国社会还是一件遥不可及的神话预言。

然而，在中国从晚清以降的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过程中，政治和社会的各种矛盾冲突非常剧烈，这个混乱的国情为最激进的革命理论提供了土壤。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得以传播到中国的基础条件。

列宁主义是带有东方专制主义和俄罗斯民粹主义双重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其要义，一是组织职业革命家集团的集权制政党，进行秘密活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一党专政；二是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积极推动世界革命，实现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打出的“消灭私有制”的旗帜，要改变人类社会千百年形成的产权结构和财产观念，这只有是依靠超级国家的暴力专政手段才能实施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的精疲力竭的俄国，列宁和他的职业革命家团队伺机起事，利用社会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一举夺取了国家政权，开创了在一个国家实现阶级专政的成功范例，即十月革命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以密谋式革命取得政权，以政党统治国家，自上而下地全面改造社会的暴力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是一系列军事共产主义的制度安排：一党专政、领袖政治；阶级镇压、红色恐怖；统制经济、掠夺农民；舆论控制、思想统一等等。在这里，既有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又有为实现这一价值理想而实施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手段。这些东西后来为斯大林所继承，形成了苏式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⁹有关苏式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可以概括出许多方面。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体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结果，而是基于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的意识形态理由建构起来的，拥有超然于社会之上权力的一党专政的国家体制。共产党以无产阶级的名义统治国家，全面控制了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思想资源，对全社会实施最完全最彻底的改造。列宁主义的共产革命是人类社会一场声

9 关于苏联史的研究，国内外著述甚多。大陆学者的研究，史论方面可参见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史实方面可参见闻一著《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势浩大的社会实验，具有颠覆过去一切文化价值和制度体制的激进特征，给 20 世纪带来了一场天翻地覆的社会巨变。

列宁主义的政党国家体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列宁主义政党是一个革命家集团的领袖党，领袖、政党、阶级的关系是倒置的。政党是代表阶级意志的先锋队，领袖是政党的头脑。阶级本体的阶级意识需要政党的灌输，否则不能由“自在阶级”成为“自为阶级”；政党需要领袖集团的集中制领导，否则就没有组织纪律的战斗力。这是一个头脑决定论的政党理论。政党的领袖集团可以用先锋队的名义，矫命阶级的名义夺取国家权力，矫命阶级的名义统治国家，矫命阶级的名义改造社会。通过组织一个领袖党，可以把无产阶级革命移植到任何地方，开展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推进共产革命。20 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疑是列宁主义政党体制的胜利。它向全世界推广了一个极权主义政党体制，制造出来了一套人类历史发展必然道路的意识形态误区，形成了一场以阶级革命为旗帜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风暴。

列宁在 1916 年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⁰，提出了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的前夜，帝国主义是战争策源地等等论断。列宁在 1917 年写的小册子《国家与革命》，提出了暴力夺取国家政权，用国家政权的暴力改造社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道路。¹¹这两个小册子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新发展，推进世界革命的理论依据，俄国十月革命的代表作。列宁和他的革命密谋集团，利用俄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打得疲敝不堪的机会，发动武装暴动，推翻了软弱的克伦斯基政府，建立了俄共独掌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于 1919 年成立了共产党国际。1920 年 7 月，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的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中，以

10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 年 1-6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575-688 页。

11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 年 8-9 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09-221 页。

预言家的口吻强调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1917年起，这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¹²然而，当列宁领导的苏俄红军，试图将共产主义世界革命从俄国推进到欧洲时，欧洲各国工人阶级非但没有响应他们的“解放者”，而是奋起抵抗。1920年8月，苏俄在与波兰的战争中，苏俄红军惨败于华沙城下，从而断绝了从欧洲推进世界革命的企图。这不仅摧毁了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预言，同时也验证了马克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不着边际，整个欧洲大陆无情地拒绝布尔什维克主义向西方的蔓延。这是导致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将世界革命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东方的一个重大原因。1924年，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做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概括。¹³中国的共产革命，就是在这个历史语境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最初对十月革命阶级专政的革命暴力在心理上是有排斥的。陈独秀、李大钊，乃至毛泽东都曾有过对革命暴力负面评价的言论。在苏俄革命输出的影响下，他们从世界革命的学理层面上接受了列宁主义，但未能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上海党组织起草的早期建党文献，如《中国共产党宣言》（1920年11月）¹⁴，《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1921年7月）¹⁵，所称的推翻资本家阶级、阶级争斗、无产阶级专政等等政治话语，其实都是来自外国共产党的抄本，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是脱节的。

1958年6月，毛泽东重读了1920年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给予了“空想”的评价。认为这个建党文件“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

12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82页。

13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547-550页。

1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5页。

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¹⁶也就是说：这个建党文件对中国革命性质上的认识是错误的，对国情认知和基本政策是错误的，采取的革命形式也是错误的，完全不清楚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农民战争的形式。这当然是事后之明的评论。问题是：这样一场“舶来”的革命运动，却获得了意外的巨大成功。这绝不是“主义”二字所能解释的，实乃是中国革命的愿力所致。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苏俄向中国输出革命的产物。在世界革命中实现中国的复兴，是陈独秀等人接受共产主义的重要因素，并成为了毛泽东这一代共产党人毕生追求的目标。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暴力革命观、阶级斗争观和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观，这是中共与生俱来的政治胎记，中国革命由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在中国共产革命的过程中，陈独秀最后成为了“终身反对派”，摒弃了十月革命道路和斯大林体制，重新肯定了欧美主体制的价值。¹⁷莫斯科派领导人照搬苏联十月革命道路的中国苏维埃革命，在城市和农村都失败了。毛泽东则搞出了一个与苏联道路不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农村为革命基地逐渐发展力量，取得了夺权革命的胜利。这是在马列主义阶级斗争观念指导下的新式农民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进而把阶级斗争运用于治国理政方面，接连不断地进行各种政治运动，以推动共产主义的早日实现。文革中被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三个里程碑”的毛主义，也就是阶级专政论在固权革命上的继续发展，以至于造成了文革的巨大灾难。以往的成功经验却成为以后失败的伏笔，历史的复杂性也就在这里。

二、《共产党宣言》与中共领导人的马列主义学养

中国的共产革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这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无产阶级革命，有着跨时代的时空落差。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穿越这两个时空环境的理论创见。毛泽东没有读马列主义原著的学养能力，对马列主义著作的阅读量非常有限，对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80-381页。

17 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二十八年。

原理的掌握远不及在莫斯科吃过洋面包的留学生，但在本土化的融会贯通能力上却是全党无人可及的。在这个中国革命实践意义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土洋结合，学用贯通，是一种“不经不典”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把西方的马列主义学说与本土的中国农民造反传统相结合，打通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与传统农民战争“杀富济贫”底层正义的联系，概括为“阶级斗争”四个字。他在延安庆祝斯大林60岁生日的讲话中，要言不烦地归纳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¹⁸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夺权道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阶段论上是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翻版。在革命动员方面，毛泽东改变了马克思、列宁等革命导师轻视农民革命性的看法，把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与中国农民造反运动的结合，贯通了《共产党宣言》阶级革命的正义性与《水浒传》替天行道的正义性。

从文本学意义上讲，在中国共产革命的意识形态建构上，那些大部头的马列原著可能起不来多少作用，倒是那些小册子更具根本性。中共高层领导人都有读小册子的经验体会，都有删繁就简的“相结合”能力。所谓“相结合”，说到底，就是为我所用的变通性。这也就是传统学术讲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的关系。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走的就是“六经注我”的路线，并不拘泥马列经典的言语，策略灵活机变，最后是以革命的成功作为“相结合”的成果。而更熟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亦步亦趋执行国际路线的王明等人，则为“六经”所困，掉到了书袋里面，与中国国情“结合”不起来。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给井冈山的老战友曾志说：“马列主义的书要经常读，当然不必要一律都精读，而是遇到实际问题，就去请教马列主义，时常翻阅，从理论上进行分析。”他举自己的读书经验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

18 《毛主席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该文与原文有些许出入。

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¹⁹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搞清楚党的路线问题。1943年12月14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用半年时间学习六本书。即《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上下册。强调学习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联系实际。这实际上是以马、列、斯的五本书，对照毛泽东编辑的《两条路线》的中共历史文献，批判国际路线领导人。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向全党提出学习上述马、列、斯五本书的号召。他说：“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²⁰他希望能有五千到一万人去读过，有个大致的了解。

毛泽东在七大的大会结论中，还专门谈了党性与个性的问题，解释了个性、自由、人格的发展，引据了《共产党宣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话。毛泽东说：“不能设想把一百二十万党员变成一百二十万块木头，不能把党员变成一模一样，那会有什么党性！只要服从党，在此范围内尽量发展各人的长处，不要只喜欢那些纸糊泥做的人。”²¹他还严厉批评了党内一些人的“装”、“偷”、“吹”的学风。“要讲真话，不偷、

19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转引自《缅怀毛泽东》（上），第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15页。曾志回忆毛泽东与她讲话的时间是1939年底，似记忆有误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最初是1940年1月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曾志在延安与毛泽东来往很多。毛讲他在写作《新民主主义论》时，反复阅看《共产党宣言》，应是后来的谈话。

20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351页。

21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6页。

不装、不吹。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²²

毛泽东这一代中共领导人，是从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打拼出来的，都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善于因地制宜地总结经验，审时度势地决定政策，有自己的一套学以致用学习方法。

刘少奇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比较系统地接受过马列主义理论训练，马列主义理论素养比较高，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读的也比较多。刘少奇在1964年给朱理治的信中，介绍了他读马列著作的经验：“越大本头书，越记不住。读书不在多，只要关键的东西读了，如《共产党宣言》、《社会发展史》，起作用的是这些小册子，到了有问题的时候翻一翻。”²³

林彪也是党内很会读书的人，很善于思考问题，对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尤其有心得。林彪读书有剥丝抽茧的本领，经验是少而精，删繁就简，提取精华。林彪读书喜欢做卡片，摘取核心的句子。他提出的学马列的“走捷径”，学毛著十六字方针，“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也是他自己读书的经验之谈。他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也是以《共产党宣言》为基本。林彪读《共产党宣言》，用裁剪法读书，一本书剪到最后，只有“大工业、大机器”这几个字了。²⁴

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针对党内反改革势力掉书袋，以“姓资姓社”诘难改革开放，讲了他们这一代如何读马列书的箴言：“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邓小平特别强调说：“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并不玄奥。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

22 同21。

23 刘少奇：《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24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西，很朴实的道理。”²⁵

这些中共高层领导人讲的读书经验，都是很朴素很实在的道理，也是他们领导革命的真知灼见。中共的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化繁为简，一言蔽之，就是小册子革命、小册子治国。在革命的“学以致用”的小册子中，《共产党宣言》提供了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具有树立“道统”的价值意义。历史与理论结合，理论与实践结合，从面临的具体问题读书，读书要精炼、要管用、要能够解释现实问题，这是毛泽东一代领导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态度。这种学以致用、实事求是学风，使他们具有政治上极其灵活的变通能力。在意识形态的原则性后面，又有政策变化的灵活性。

三、《共产党宣言》与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建构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中共筹谋建立新中国的重大会议。全会以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作为新中国建立的政治理论，向全党提出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政党和国家学说、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建设任务，开列出了12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书籍。²⁶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如果在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12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12本书，那就很好。²⁷

在中共建政之后，《共产党宣言》是建构新中国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石，表达了“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但是，对《共产党宣言》中轻视农民的认识，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它的不足之处，苏共也没有搞好，而中共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发展。²⁸

在急速完成了城乡社会主义改造之后，中共领导人认为这是对

25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82页。

26 即《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列宁主义基础》、《联共党史》、《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建设》、《列宁斯大林论中国》、《思想方法论》。

27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时作总结讲话（1949年3月13日）。

28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1956年7月。

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在1958年1月的杭州会议上提出：现在如何去看《共产党宣言》，也是理论与中国实际的结合。²⁹毛泽东在此说的这个相结合的问题，是从社会动员的角度讲的。如上述1958年毛泽东评论1920年《中国共产党宣言》空想时讲：“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会主义的革命，是空想的。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则是基本正确的。但土地国有是不正确的。没有料到民族资本可以和平过渡。更没有料到革命形式不是总罢工，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基本上是农民战争。”³⁰

在国家施政方面，《共产党宣言》所言的无产阶级执政后采取的十项政策措施，成为了中共在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方向性目标。在反右派运动后，其观念革命的部分又得到强调。

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共产党宣言》所讲的未来社会政策，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从政策设想层面，推到了“抢先进入共产主义”的现实政策层面。在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总路线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³¹

大跃进中，国家有关部门从马恩列斯的著作中摘编了《论共产主义公社》³²小册子，下发各地，作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方向目标。这些小册子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未来无产阶级国家的政策设想：工业和农业结合、消灭城乡对立、教育与物资生产结合、义务劳动制、农业产业军、总计划开垦荒地等，作为为了政策制定实施的理论依据。在大跃进运动中，“两条腿走路”、破除“法权”、“工、农、商、学、兵”一体的人民公社体制、公共食堂、全民炼钢、大办教育文化、大办各行各业、大规模移民边远省份等激进的发展政策。

《红旗》杂志1959年第2期发表了署名文章《社会主义农业产业军》，喜气洋洋地宣称：《共产党宣言》中曾经提出的农业产业军的纲领，“在我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³³

29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4日。

30 毛泽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551页。

31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1958年7月1日。

32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论共产主义公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33 童大林：《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

在1960年代的“反修防修”运动中，《共产党宣言》的传播学意义又有了新的变化，成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一个理论武器。在中苏论战中，《共产党宣言》是中共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的道统符号，运用于“九评”之中。

中共的“反修斗争”是与苏共争夺正统性的斗争，但中共高级干部的马列主义学养实在很低，许多军队高干连《共产党宣言》也没有好好读过。如某军队高干讲：“书，我们老早就有了，先是挑夫挑着，后来马驮着，以后又用汽车载着；但就是没读它。”³⁴ 1964年2月，毛泽东要求高级干部学习马列主义著作，指示中宣部开列了学习马恩列斯和普列汉诺夫的30本书的书单，第一篇就是《共产党宣言》。³⁵

从实际效果看，马列导师的这些书对于各级干部们还是太深了，他们能看得懂的还是毛泽东的东西。为此，中央编发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提供给普遍干部和群众学习。真正大行其道的是还是林彪在军队推出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这些“急用先学”的实用主义东西。毛泽东个人崇拜在1960年代的狂热，与中共干部普遍低下的文化程度是大有关系的。

在“四清”运动的大抓阶级斗争中，夺权革命的暴力革命基因被再度激活。1947年激进土改的一些做法，在“四清”的大整基层干部中又重复出现了。

1964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讨论“四清”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又举《共产党宣言》为例，讲阶级斗争策略问题。他说：“列宁很重视农民，提工农联盟。《共产党宣言》就怕小资产阶级，把小资产阶级的缺点、消极面提得过多。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看你强调哪一面。中国有多少小资产阶级。流氓无产者更多。对流氓无产者更不客气。就强调消极面？他有积极的一面嘛！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改造的。”³⁶ 虽然毛泽东的讲话语境，具体

《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59年。

34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文件附件，1964年2月15日。

3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5-28页。

36 《毛泽东思想万岁》（编者不详），第5册，第197页。原标题为“在中

针对的是四清运动不要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同时又带有了民粹主义的观念意识。

在1960年代的对外“反修”和对内“防修”的交互作用下，毛泽东“不经不典”的马列主义被自我封圣化了，成为了对马列主义的新发展。林彪表述为：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林彪这个理论表述得到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肯定。³⁷

在论证毛泽东如何“继承、发展”马列主义时，《共产党宣言》是一个重要的比对标准。陈伯达说：“主席说：《共产党宣言》很大的缺点是对农民、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亚洲的局面。”康生从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方面论证，“毛泽东思想全面发展丰富了超过了马列主义”³⁸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王明为讨好毛泽东，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概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应用和发展”。毛泽东认为不妥，说不要想宽了，要先把自已的事情做好。不要把毛泽东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但此时，毛泽东却欣然接受了这些更无厘头的佞臣谀词。这反映了毛泽东领导世界革命的大格局意识。

在红卫兵造反运动中，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再度成为了“继续革命”的“葵花宝典”。青少年红卫兵把它们作为阶级斗争的革命教科书，把打、砸、抢、抄的胡作非为当作是革命行动，真诚狂热地开展了这一场“红色恐怖”的革命。群众运动革命造反的民粹主义思潮再度泛滥成灾。

在文革进入到夺权阶段之后，毛泽东“继承、发展”的内容又扩大，认为是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巩固政权的问题，所以

央工作座谈会上关于四清问题的谈话”，实际是毛泽东1964年12月20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37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

38 陈伯达1966年5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康生5月25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参见群众组织编印：《中央首长讲话》，1967年12月。

“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伟大的里程碑”。³⁹这里讲的在“巩固政权”上的新创造，就是把“走资派”也作为革命对象。在解决群众运动派性斗争阶段，毛泽东又发出“斗私批修”的号召，为马列主义的“继承、发展”增添了新的内容。把“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发展到解决世界观问题的“治心”阶段。

我们可以从在《人民日报》每年在11月7日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中看到这个“继承、发展”的变化。文革前1964年、1965年的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中，“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是从巩固政权的角度来提起的。⁴⁰到文革中的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的社论，则成了改造人的世界观的需要了。这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称毛泽东是“当代的列宁”、“第三个里程碑”。定义了“继续革命”理论的六个要点。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解决世界观问题。⁴¹这就把马克思基于生产力基础上的阶级斗争学说，发展为观念领域的阶级斗争学说。

上述可见，《共产党宣言》在文革中表示的政治意象，实际上是毛泽东“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参照和对比文本。但这种参照和对比，只能是毛泽东才能做的事情。1970年8月林彪之子林立果在空军“三代会”上做“讲用报告”，被那些溜须拍马的群小们吹捧为“第二个《共产党宣言》”、“第四个里程碑”。这就是“僭越”之举了，反而是帮了倒忙。搞个人崇拜的效果，从来都是降低人们的智商的。

在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人集团试图以“天才论”为武器打击张春桥文人集团，遭到毛泽东的迎头痛击。会后，毛泽东指示全党要读书学习马列主义，列了11篇必读书目，《共产党宣言》是首篇。⁴²“学马列著作”，是毛泽东要结

39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40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4年11月7日；《沿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奋勇前进》，1965年11月7日。

41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42 《中共中央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1970年11月6日）规定书目：马列著作六篇：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2、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3、马克思：《法兰西内战（选读）》，4、恩格

束军管体制，恢复“文治”的重要措施。毛泽东的著作，悄然放在马列之后。在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也更强调的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方面。

林彪事件的发生，使文革意识形态陷入极大混乱。毛泽东为了说明文革是符合马列主义道统原则的一场革命，又让张春桥、姚文元选出了马列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 33 条，在全国开展了一场“学理论”运动，在社会上再度掀起“反法权”的活动。在重新修复文革意识形态中，《共产党宣言》是最基本的文本。

文革中的学习和宣传《共产党宣言》，反复强调的是两个观点：一个是“两个彻底决裂”的观点。即：“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另一个是“两个必然”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中共宣传机器把它概括为“资产阶级必然灭亡，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粗浅论断。

“两个彻底决裂”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一个理论支柱。基本意思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仅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只有抓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才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⁴³文革中，在“两个彻底决裂”的名义下，一切荒诞不经的事情，都可以用最神圣的革命理由推而广之。

文革的那些违背人们生活常情常理的口号和“新生事物”，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工农兵学员“上、管、改”，革“小生产”的命，把农民搞点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道路等等，都是打着“两个决裂”的名义。

从 1966 年 5 月到 1976 年 9 月，《人民日报》共发表有“两个

斯：《反杜林论（选读）》，5、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选读）》，6、列宁：《国家与革命（选读）》。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是：1、《实践论》，2、《矛盾论》，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4、《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43 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75 年 2 月 28 日。

彻底决裂”文字的文章 211 篇。其中，中共“九大”前有 25 篇，“九大”后有 193 篇。“两个彻底决裂”的文章在 1971 年后的发表数量迅速增长。最为集中的是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到 1976 年 9 月“粉碎四人帮”前夕，有 122 篇。《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两个必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的文章，从 1971 年 6 月到 1976 年 9 月，共 20 篇。这是要以《共产党宣言》为文革的正当性背书，以表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继续革命”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道统。实际上这恰恰是证明了文革在人民心目中的失败。人心的丧失，覆水难收，“继续革命”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

文革领导集团试图以《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的观念和“两个必然”的信念，来统一人们的思想，维护文革的合法性。但人们生活的逻辑，要比政治教化的力量要更为强大得多。文革后期，人们已经不能接受文革这套空洞虚假的革命宣传了，怀疑和抵触的情绪弥漫于全社会。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他苦心经营十年的文革，也就随之榱崩栋折了。

文革结束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破除了苏联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观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共把这条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总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邓小平的“相结合”的新创举，具体体现为党的领导与市场经济的“相结合”，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为抓手，发展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马克思主义道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仍然是全党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范本，不断开展学习运动，但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突破了马克思当年对未来社会的具体政策设计。《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的革命目标，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产权保护，由此，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理论上对《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两个必然”，做出了新的学理解读，补充上了马克思的“两个决不会”的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改革开放中的新发展。

“两个决不会”的观点，是马克思于 1859 年 1 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即“无论哪一个社会

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两个决不会”讲的是文明发生的历史条件，这是不能人为超越的时代性制约。毛泽东时代发生的所有革命，都是因为跨越了时代而不能成功，每一场激进革命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而在这些最激进的革命旗帜上，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言，恰恰印上的是旧时代的徽章。用野蛮时代的原始兵器，建构不起来文明时代的现代大厦。这是后发现代化国家的历史一再证明的事情。

“两个决不会”把《共产党宣言》的“两个彻底决裂”和“两个必然”，拉回到现实的土地上。这是只有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才能得到的新认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是对“两个绝不会”观点的中国化版本。《共产党宣言》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铭言，已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所理解和认识，成为了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核心价值理念，也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以人为本”的民主法治方向的时代规定性。

四、结论

毛泽东把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运用于中国共产革命实践中的“相结合”能力，比同时代人更加高明，从而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论述了毛泽东在革命、建设、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对马列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归纳出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面：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从经典文献的形成与演变的传播史角度，可能是一个考察和理解毛泽东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理路的简达之道。在理解中国共产革命的文本选项中，《共产党宣言》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理想文本。从《共产党宣言》的传播过程，我们可以试图理解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独特路径。

参考文献

1.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
2. 陈伯达：《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三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演》，1958年7月1日。
3. 陈独秀遗著：《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自由中国社出版部，民国二十八年。
4.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5. 《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伟大的历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
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7. 解放军某部理论小组：《同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人民日报》1975年2月28日。
8.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卡尔·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
10. 李根清：《毛家湾林彪琐事》，《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
11.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2. 列宁：《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1917年8-9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3. 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
14. 刘少奇：《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
15. 《刘少奇关于高级党校工作问题对杨献珍、侯维煜的两次谈话纪要》，1956年7月。
16. 陆南泉、黄宗良、郑异凡、马龙闪、左凤荣主编的《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
17. 毛泽东：《关于农村调查》，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8.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
1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毛泽东

- 文集》第3卷。
20. 毛泽东《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21.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58年1月4日。
 22.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一集），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文革筹委会1967年5月编印，“编后”。
 23. 《毛泽东思想万岁》（第二期），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红卫兵毛泽东思想小组1967年1月25日编印，“编后说明”。
 24. 《毛泽东思想万岁》（上），河南二七公社河南农学院红卫兵总部1967年8月编印，“前言”。
 25. 《毛主席十年前所作的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的论文和演说》，《人民日报》，1949年12月20日。
 26. 群众组织编印：《中央首长讲话》，1967年12月。
 27. 《人民日报》编辑部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1964年11月7日；《沿着伟大十月革命的道路奋勇前进》，1965年11月7日。
 28.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1967年11月6日。
 29. 【日】竹内实著：韩风琴、张会才译：《毛泽东传记三种》，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
 30.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
 31. 宋镜明：《李达传论》，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2. 童大林：《社会主义的农业产业军》。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农业经济组编：《学习中共中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文集》，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59年。
 33. 闻一：《俄罗斯通史（1917-1991）》，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34.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转引自《缅怀毛泽东》（上），第二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
 3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37.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编：《论共产主义公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8年。

38. 《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恩、列、斯著作的批示》文件附件，1964年2月15日。
39.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

中国瑶学研究七十年

玉时阶 玉璐

摘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到来之际，全面探讨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客观地认识和总结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有助于在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进程中，正确认识瑶学研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中国瑶学；瑶学研究；七十年

作者：玉时阶，教授，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研究方向：瑶族历史文化，邮箱：ysj303@163.com；玉璐，助理研究员，南宁师范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研究方向：中国南方民族史，邮箱：89605539@qq.com

Title: Seventy Years of Yao Studies in China

Abstract: As we approach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tak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past challenge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Yao studies. To conduct a thoughtful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current status, objective perception and summary of Yao studies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achievement and experience for the last 70 years. And examine how this can aid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reform and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xiaokang*). To celebrate the upcoming of "Two Centenaries", we must identify the challenges ahead in order to strengthen "four self-confiden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to actualize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words: Yao Studies in China; Yao Studies; 70 years

Authors: Yu Shijie, professor, Yao Studies Research Center of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is main research areas ar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Yao people, E-mail: ysj303@163.com; Yu Lu, research assistant, Journal of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orial Office,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Her main research area is ethnic history in south China, E-mail: 89605539@qq.com

自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既开创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新时期、新局面, 也带来了中国学术研究领域的繁荣与发展。70 年来, 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繁荣、发展, 中国瑶学研究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 并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一批优秀的瑶学研究专家、学者不断涌现; 瑶学研究创新成果大批产生; 瑶学研究机构从无到有, 茁壮成长。

一、主要成就

瑶族是一个历史文化悠久的跨境民族。据 2010 年统计, 全世界约有瑶族 370 万人, 其中中国约有 280 万人, 其余的 90 多万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早在秦汉时期, 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对瑶族先民有所了解。唐宋之后, 中国的正史和其他史籍就对瑶族有所记载。20 世纪 20 年代后, 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用人类、民族学等方法对瑶族进行调查研究, 虽然他们的调查研究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看都有一定的局限, 但毕竟为后来的研究积累了不少的资料和有价值的研究线索。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经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瑶族语言、社会历史与民间文学的调查, 出版和发表了一批瑶学研究的成果, 培养造就了一批瑶学研究学者。但总的说来, 这一时期的瑶学研究毕竟是刚起步不久, 研究成果不多, 影响不大。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 中国学者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与科学研究, 学术成果不断

1 乔健、谢剑、胡起望:《瑶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4页。

问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国际交流日趋频繁,学科建设成绩显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比,改革开放40余年是中国瑶学研究得到空前发展的黄金时期。总的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瑶学研究的发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发展阶段都不能比拟的。其主要成就表现如下:

(一) 中国国内学术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派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深入广西、湖南、广东、云南的瑶族地区进行社会历史调查,为中国瑶族识别、研究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后,广西、云南、广东、湖南等省区的出版社分别将这些资料整理、编辑出版,主要有《广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1-9册)、《云南苗族瑶族社会历史调查》、《湖南瑶族社会历史调查》、《连南瑶族自治县社会调查》、《瑶族〈过山榜〉选编》等,这些调查资料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术成果。

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开拓创新,广泛开展田野调查与科学研究,瑶学研究学术活动空前活跃,交叉学科、边缘学科不断诞生,扩展了瑶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术成果不断问世,一批新人不断成长。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仅公开出版的瑶学研究著作就有200余本。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成果主要有《盘村瑶族》(1983)、《论瑶族传统文化》(1990)、《贵州瑶族》(1990)、《瑶族历史与文化》(1992)、《中国瑶族风土志》(1992)、《瑶族史》(1993)、《国际瑶族概述》(1993)、《瑶族传统文化》(2000)、《瑶族文化史》(2001)、《金秀大瑶山瑶族史》(2002)、《瑶族文化变迁》(2005)、《瑶族文明发展历程》(2008)、《跨越族群边界》(2008)、《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文化变迁》(2008)、《布努瑶社会历史》(2010)、《当代云南瑶族简史》(2012)、《瑶族》(2015)、《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2016)、《瑶族盘王节文化》(2019)等;瑶族语言文字研究的成果主要有《瑶族语言简志》(1982)、《炯奈语研究》(2002)、《瑶族的勉语方言研究》(2004)、《优诺语研究》(2007)、《瑶族拉珈语简志》(2009)、《布努语简志》(2009)、《藻敏瑶语语言研究》(2016)等;瑶族宗教研究成果

主要有《瑶族的宗教与社会》(2006)、《瑶族盘王祭祀大典——瑶族盘王节祭祀礼仪研究》(2010)、《信仰治疗——广西盘瑶巫医研究》(2012)、《信仰之手:广西盘瑶巫师群体权力研究》(2016)等;瑶族民间文学艺术研究主要有《瑶族歌堂诗述论》(1988)、《瑶族文学史》(修订本,2001)、《云南瑶族道教科仪音乐》(2008)、《瑶族“坐歌堂”的结构与功能》(2009)、《盘瑶神像画研究》(2011)、《瑶族服饰》(2012)、《瑶族长鼓舞》(2012)、《瑶族黄泥鼓舞》(2013)、《瑶族审美文化》(2013)、《田林瑶族铜鼓舞》(2014)、《盘瑶与蓝靛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2016)等;瑶族民间法研究主要有《瑶族石牌制》(2000)、《瑶族习惯法》(2008)、《瑶族习惯法与社区控制和法制秩序构建》(2014)等;瑶族教育研究主要有《走进竹篱教室》(2004)、《公平与和谐:瑶族教育研究》(2007)、《仪式中的记忆过程——云南文山蓝靛瑶“度戒”仪式的教育人类学分析》(2014)等;婚姻家庭研究主要有《瑶麓婚碑的变迁》(1998)、《广西红瑶》(2015)、《家屋与家先——粤北过山瑶的家观念与实践》(2015)等;瑶医药研究主要有《中国瑶药学》(2002)、《中国瑶医学》(2012)、《神奇独特的瑶医药》(2004)等;瑶族民间古籍整理的研究成果主要有《盘王大歌》(1987)、《评皇券牒集编》(1990)、《瑶族石刻录》(1993)、《密洛陀》(1999)、《密洛陀古歌》(2002)、《瑶人经书》(2000)、《瑶族文书档案研究》(2011)、《梅山图注》(2017)等;特别是奉恒高主编的《瑶族通史》,是中国的瑶学研究者奉恒高主编的领导下,联合广西、广东、湖南、云南、北京、上海等地的瑶学研究人员,采用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宗教学、遗传学、教育学等多学科合作攻关,历时8年,才完成撰写、出版工作,结束了瑶学研究没有通史的历史,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获200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并入选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此外,由奉恒高主编、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瑶学丛书”,不仅重视当代瑶族历史文化研究,而且对出版后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著作也纳入“瑶学丛书”再版。目前,“瑶学丛书”已出版瑶学研究著作40本,像《桂北瑶歌的文化的阐述》(2008)、《花蓝瑶社会变迁》(2012)、

《金秀瑶族村规民约》(2012)、《中越边境线上的蓝靛瑶》(2014)、《旅游业与滇越跨境民族贫困问题研究》(2014)、《瑶族石刻研究》(2015)、《科技进步视角下瑶族生活的历史变迁》(2018)、《木柄瑶社会历史与文化研究》(2018)、《瑶族归侨社会研究》(2018),国外学者的《泰国瑶人——过去、现在和未来》(2006)、《越南瑶族民间古籍》(2011)、《越南瑶族的今昔》(2018)等国内外当代瑶族历史经济文化著作,而且像杨成志等人的《20世纪上半叶瑶族调查报告文集》(2014)、费孝通的《花蓝瑶社会组织》(2016)、吴永章的《瑶族史》(2016)、胡起望与范宏贵的《盘村瑶族》(2016)也都在“瑶学丛书”再版;多部在“瑶学丛书”出版后的著作获省部级优秀成果奖。“瑶学丛书”在中国国内外瑶学研究领域的好评与影响正与日俱增,成为当今中国国内外瑶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和出版界的民族文化品牌。除了学术著作外,这一时期,许多学者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据中国知网统计,大约有1300篇关于瑶学研究的论文发表在各类学术刊物上。

(二) 国外瑶族调查及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瑶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瑶学研究机构与学者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加强与中国国内外学术界的联系,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到国外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许多国外学者也到中国进行瑶学调查研究。

自1986年起,国际瑶学会先后在中国香港、泰国曼谷、法国巴黎、美国旧金山、越南河内、中国云南河口等地召开国际瑶学研讨会,中国学者均有人出席会议,并作大会发言,既开拓了视野,也促进了国际学术交流。这一时期,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国瑶学研究者开始了国外瑶族调查研究。1989年2月17日-4月4日,应泰国朱拉隆功大学邀请,广西民族学院派陈永昌、姚舜安、张有隽、李增贵和玉时阶赴泰国北部瑶族地区考察,并在清迈召开瑶族学术研讨会,回国后出版了《泰国瑶族考察》(1992)一书。该书出版后,在学术界获得好评。姚舜安、张有隽、玉时阶等人还在《民族研究》《世界民族》《广西民族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泰国瑶族的论文。2019年4月,广西民族大学的玉时阶教授等人应泰国清莱皇家大学的邀请,

再次到泰国清莱府瑶族地区调查。2008年,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及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签署“中越跨境瑶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科研合作协议。同年12月,广西民族大学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和盘美花应邀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进行考察,并参加在老街省召开的“红河流域经济文化交流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11月,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召开“中越跨境瑶族经济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了会议论文集——《跨境瑶族研究》。2010年12月、2012年11月、2016年7月玉时阶、王柏中等人又多次到越南老街省瑶族地区调查。玉时阶、王柏中、胡牧君、滕成达、盘美花等人后来都在《世界民族》《社会科学战线》《外国教育研究》《广西民族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越南瑶族的论文。2014年,谷家荣等人到越南老街省沙巴县瑶族地区调查,出版了《他拼之乡:越南北部边疆瑶族社会的形构与型质阐释》(2015)。这一时期,中国国家民委及广西瑶学会还与美国瑶族协会合作,多次分别组团到对方国家的瑶族聚居区考察,中国学者林仕良、玉时阶、李筱文、赵视球等人回国后分别在《世界民族》《中央民族大学学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广西民族研究》《瑶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关于美国瑶族社会、教育、经济等方面的学术论文。何红一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的瑶族民间文献后,出版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瑶族文献研究》(2017)。2005年,袁同凯到老挝瑶族地区调查,出版了《蓝靛瑶人及其学校教育——一个老挝北部山地族群的民族志研究》(2014)。2019年5月,玉时阶、谭静、翟香丽等人应老挝国立大学邀请,到老挝瑶族地区调查研究。这些学术交流合作活动与研究成果的发表、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国际瑶学研究的发展,扩大了瑶学在中国国内外的影响。

(三) 瑶学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的建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虽然瑶学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但瑶学研究一直没有一个合作研究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都有不少人从事瑶学研究,但在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中还没有以瑶学研究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学术

团体和研究机构。改革开放后，随着瑶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各地瑶学研究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学术机构和群众性学术团体主要有如下几个：

1. 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瑶族历史文化教研室。1984年，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后，在研究所下设瑶族历史文化教研室，由姚舜安教授任研究室主任，玉时阶任研究室副主任，负责学校瑶族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这是广西最早成立的瑶学研究机构。

2. 广西瑶学学会。1984年12月，广西、湖南、广东、云南、贵州、北京等省区（直辖市）瑶族代表聚集广西民族学院欢度瑶族盘王节，并成立广西瑶族学会。1992年，广西瑶族学会更名为广西瑶学学会。此后，广东、湖南、云南、贵州等省亦分别成立各省瑶学学会。广西瑶学学会成立后，与国际瑶学会合作，先后在中国广西桂林、云南河口、香港等地召开国际瑶学学术研讨会，并与湖南、广东、云南、广西的瑶族自治县联合举办瑶学学术研讨会，将瑶学研究从书斋推向民族地区。

3. 广西民族大学瑶学研究中心。2005年，经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提议，广西民族学院成立了直属学校领导的瑶学研究中心。自治区政府先后拨款600万元，扶持瑶学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瑶学丛书”；拨款120万元，资助瑶学研究中心编纂、出版《中国瑶族百科辞典》；拨款350万元，资助瑶学研究中心修订、出版《瑶族通史》修订本。同时，瑶学研究中心积极推动瑶学研究走向世界。2008年，瑶学研究中心主任玉时阶教授主持了广西民族大学与越南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越南老街省文化体育旅游厅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中越跨境瑶族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变迁”，双方互派学者到对方国家的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分别在中国广西民族大学和越南老街省举办国际瑶学研讨会，并分别在中国和越南发表与出版研究成果。中国内外不少学者通过申报“瑶学丛书”获得经费支持，到瑶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发表论文，在“瑶学丛书”出版专著，晋升副教授、教授。瑶学研究中心通过组织、编纂、出版“瑶学丛书”、《中国瑶族百科辞典》，修订与出版《瑶族通史》，参与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汇集了一批有志于从事瑶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发展成为全中国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唯一以瑶族为研究对象的专门

研究机构，成为广西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为广西民族大学的更名、博士点申报和博士点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瑶学”亦发展成为广西人文科学研究中一个有特色的重要学科。

4. 广西瑶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会。进入 21 世纪以来，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受到极大的冲击，2013 年，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奉恒高提议，广西瑶族文化保护与发展促进会在广西南宁成立。该会成立后，致力于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瑶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并对贺州市申报瑶族文化（南岭）生态保护区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推动了瑶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

二、学术热点

70 年来，围绕瑶学研究的一些现实问题与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学者不断进行争鸣、探讨，推动了瑶学研究的思想解放，拓展了瑶学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在中国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 关于瑶族族源的讨论。过去，学术界对瑶族族源的研究有“长沙武陵蛮”“五溪蛮”“山越”“古瑶民”等不同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与“长沙武陵蛮”或“五溪蛮”关系较密切。² 改革开放后，经过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遗传学等多学科合作探讨后，大家一致认为：瑶族是一个有 5000 年悠久历史文化的民族。瑶族族源应追溯到三皇王帝时期的九黎部落中的蚩尤，以及后来的三苗、蛮、南蛮、长沙武陵蛮，其原始居住地应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淮河中上游地区。³

2. 关于瑶族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探讨。历史上，瑶族是否经历过奴隶社会，过去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的探讨，学术界一致认为，瑶族历史上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其社会历史的发展直接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进入封建领主制社会。⁴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瑶族社会性质问题，学术界有

2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 年，第 12 页。

3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21-22 页。

4 玉时阶：《唐宋羁縻制度对广西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 年第 1 期，第 29-34 页。

“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封建领主社会”等不同说法。通过20世纪80年代末的探讨,学术界一致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瑶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地区的瑶族,如湘桂边界一带的平地瑶已萌芽了资本主义的因素;⁵绝大部分地区的瑶族,如广西、广东、湖南等地的盘瑶已经入了封建社会;⁶有的地区的瑶族,如云南西双版纳地区的瑶族仍处于封建领主制社会;⁷有的地区的瑶族,如广西十万大山的山子瑶与广西南丹县的白裤瑶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发展阶段。⁸

3. 关于瑶族语言文字问题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前,学术界认为瑶语大致可分为勉语瑶语支、布努语苗语支、拉珈语侗水语支和汉语西南方言。⁹21世纪后,经过不断调查研究,学术界认为,瑶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本民族的语言——瑶语。但现在的瑶族语言已经不能简单地用“瑶语”来代表瑶族语言了。从瑶族的发展来看,瑶族是由不同来源的民族或族群所组成的多语种的民族共同体,瑶族族源和语言的多元性,决定了她不是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而是一个语言多元的民族。由于历史上的原因,瑶族语言在形成过程中,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语言。在其内部,瑶语又可分为“勉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拉珈语”“汉语方言西南官话”。这些语言都具有汉藏语系语言所共有的特征,都是汉藏语系的语言,但它们又分别属于不同的语族和语支:勉语属苗瑶语族瑶语支,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优诺语属苗瑶语族苗语支,拉珈语属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汉语方言西南官话属汉语族,它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化特点。

历史上瑶族是否有自己本民族的文字,经过这几十年的探讨,

-
- 5 周宗贤:《试论瑶族封建社会形成的特点》,《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第57-62页。
 - 6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第27-32页。
 - 7 郑立行:《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址》,《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第17-20页。
 - 8 张有隽:《近代瑶族社会形态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1-138页;玉时阶:《白裤瑶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页。
 - 9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175-183页。

大都数人基本上认为：历史上，瑶族人民在学习、使用汉文的基础上，仿效汉字创造了一些土俗字，并在部分瑶族的经书、“祖图”“家先单”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帮助瑶族人民创造了拼音瑶文，并在部分瑶族聚居区试行使用。¹⁰

4. 关于盘瓠与盘古传说的探讨。过去不少学者与瑶族群众都把盘瓠与盘古混为一谈，民国初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夏曾佑以及历史学家顾颉刚、范文澜等人均持此观点。¹¹ 改革开放后，经过多次学术研讨会的研讨，大多数学者认为，瑶族虽然崇拜盘古与盘瓠，但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盘古与盘瓠虽然都是瑶族崇拜的共同祖先，但分别属于不同传说时代的神、人。¹² 盘瓠传说反映的是瑶族盘瓠图腾崇拜，¹³ 而盘古，瑶族则只是将其作为一个开天辟地的人类始祖神进行崇拜。¹⁴

5. 关于千家峒问题的研究。千家峒是千百年来在瑶族民间广泛流传的美丽神话传说，是广大瑶族群众心目中的圣地。长期以来，许多瑶族群众向往千家峒，寻找千家峒，掀起一次又一次的寻找千家峒运动。但千家峒在哪里？一直是历史之迷。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先后在湖南江永、临湘，广西灌阳等地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探讨千家峒问题。武汉大学宫哲兵教授认为千家峒在湖南江永、道县与广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地带，中心位置是韭菜岭。¹⁵ 但学术界大多数人对此持异议，认为还需进一步研究，费孝通先生为此题词留言：“瑶族寻根千家峒，史实有待百家争。”2001年，广西瑶学学会在湖南临湘召开学术研讨会，就千家峒问题进行专题

10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第165页。

11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12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3-24页。

13 彭官章：《盘古并非盘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第56-59页。

14 李本高：《盘古非盘瓠：从瑶族文献中看盘古与盘瓠的区别》，《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第49-50B页。

15 宫哲兵：《从〈千家峒〉文献考证瑶族逃离千家峒事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第74-83页；宫哲兵、欧阳锡盛、陈嘉文等：《瑶族千家峒故地再辨析》，《民族论坛》，1989年第2期，第23-29页；宫哲兵：《论都庞岭千家峒是瑶族发祥地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第50-55页；宫哲兵：《从县志碑文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第68-73页。

讨论。经过大会讨论与学术考察,大多数学者认为,千家峒是瑶族人民心目中的圣地与精神家园,是瑶族人民在迁徙过程中不同时期居住过的地方。历史上的千家峒不止一个,临湘市的龙窖山,江永、道县、灌阳交界的都庞岭都有可能是瑶族心目中的千家峒。随着研究的深入,可能还会发现别的历史时期的千家峒。

6. 关于漂洋过海问题的探讨。漂洋过海是盘瑶民间广泛流传的民间故事,在瑶族《过山榜》及部分经书中也有记载。但是否是史实?其发生年代、地点等也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历史上,瑶族及其先民是否曾经历过漂洋过海,虽然部分学者过去多持否定态度,但是一部分学者与瑶族群众则认为确有其事。由于双方认识差异较大,不仅学术界就此展开热烈地讨论,甚至有不少在基层工作的瑶族知识分子也积极撰文参加争鸣。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多次探讨,学术界基本上达成共识:即瑶族及其先民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可能发生过“漂洋过海”的史实。但这个“海”,有可能是大江湖泊,因为在古代瑶族先民的眼中,他们往往会将一些大江、大湖也视为“海”。古代瑶族先民住在长江以北,他们在由北向南迁徙过程中,必须漂渡长江及洞庭湖,才能进入湖南、广西。像长江、洞庭湖这类大江、大湖,对原先一直居住在陆地上的瑶族及其先民来说,把它看作“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在瑶族中也有把大江大河称为“海”的说法。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漂洋过海应指瑶族先民从闽、浙、淮一带渡东海到广东南海、乐昌,及后来又从广东钦州(今属广西)等地渡琼州海峡进入海南岛。从时间上看,瑶族及其先民漂洋过海有早有晚,最早可能在晋代,因为南北朝时洞庭湖一带已有瑶族先民居住,最晚可能是清代。¹⁶

7. 关于瑶族迁徙问题的探讨。历史上,瑶族一直过着迁徙不定的、刀耕火种的山地游耕农业生活。但过去对这方面的研究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瑶学研究人员经过大量深入的田野调查及文献搜集,特别是到国外瑶族地区调查后,大多数学者认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瑶族刀耕火种的游耕生产方式、封建统治阶级对瑶族的流放与征调、战争动乱、自然灾害与疾病是造成瑶族长期迁徙的重要原因。唐宋之前,瑶族主要是由北向南迁徙。宋之后,则是北向南和西南迁徙,其迁徙路线主要有三

16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第26-28页。

条：一是从湖南、福建向广东、广西、越南、泰国迁徙，二是从湖南向广西、广东、云南、老挝、越南、泰国迁徙，三是由湘南沿湘黔桂边界入广西、贵州。¹⁷ 20世纪70年代末，瑶族被联合国难民署安置到欧美等国。

三、新时代继续加强瑶学研究的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瑶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由于瑶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社会经济发展较缓慢且不平衡，没有反映、表达本民族语言的文字，加上汉文文献资料较少，所以目前的成果仍未能使人满意。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的新时代进程中，客观地认识和总结中国瑶学研究7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正确认识瑶学研究未来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和任务，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继续奋发拓展，促进瑶学研究向纵深发展，取得更大的成就，方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

首先，要进一步加强瑶族支系个案研究，构筑瑶族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瑶族是一个支系众多，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特色较为鲜明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支系瑶族都形成了自己的族群特点与文化特色。其文化的发展既有共性，又有支系特点与地域差别。¹⁸ 加强瑶族支系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研究，有利于了解各支系瑶族的历史文化特点，探讨他们与瑶族这个大家庭的文化共性，加深瑶族历史文化的厚重感，构筑瑶族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

其次，要加强对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每个民族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其特有的民族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是其对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瑶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瑶族人民辛勤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与世界文化宝库中的珍宝，是滋养民族生存、激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团

17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1-68页。

18 玉时阶：《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9页。

结、维护中国统一、促进民族繁荣的巨大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深入挖掘瑶族传统文化中爱惜生灵、崇尚自然、信守诚信、守望相助、追求大同、讲仁爱、崇正义的时代价值，弘扬瑶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对增强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加强对瑶族和中华民族关系的研究，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的概念本身就是国家民族的概念，而56个民族及其所属的集团是社会构成的基本单位。”¹⁹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都做出了贡献，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但以往的瑶学研究，大多忽视了瑶族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所以未能很好地理解瑶族的融合、分化、形成、发展问题。只有把瑶族研究放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视野下去研究，才能正确理解历史上瑶族的融合、分化、形成、发展问题，才能明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辩证关系，才能弄清楚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怎么形成的，才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共同构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共有家园。

第四，要加强国外瑶族研究，进一步夯实新时代中国国内外瑶族及其居住国的友好合作基础，实现“合作共赢”。瑶族是一个跨境而居的国际性民族。现在，世界上大约有370多万瑶族，其中约有280万人居住在中国，其余的90多万人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中国是瑶族的发源地，中国国外的瑶族都是明清之后从中国迁徙去的。²⁰瑶族从中国进入东南亚的山地之路和从东南亚进入欧美的海洋之路，既是山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流之路，也是中西文化和南北文化交流的汇集地，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是瑶学研究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当前，中国正致力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国外瑶族分布区刚好处于中国从南部走向世界的地区。加强国外瑶族研究，进一步夯实新时代国内外瑶族及其居住国的友好合作基础，可以促进中国与世界各

19 麻国庆：《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第1-6页。

20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第61-68页。

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合作中实现“合作共赢”。²¹中国当前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迎接“两个一百年”的新时代进程。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新时代的瑶学研究，就不能“闭关自守”，关起门来做学问，必须走出国门，加强国际合作研究，让世界学术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理论中的中国”“瑶学研究的中国”，促进世界瑶学研究的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 奉恒高：《瑶族通史》上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
2. 宫哲兵：《从〈千家峒〉文献考证瑶族逃离千家峒事件》，《广西民族研究》，1989年第3期。
3. 宫哲兵：《论都庞岭千家峒是瑶族发祥地之一》，《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 宫哲兵：《从县志碑文考证千家峒在都庞岭：瑶族千家峒故地考》，《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2期。
5. 宫哲兵、欧阳锡盛、陈嘉文等：《瑶族千家峒故地再辨析》，《民族论坛》，1989年第2期。
6. 李本高：《盘古非盘瓠：从瑶族文献中看盘古与盘瓠的区别》，《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6期。
7. 麻国庆：《家的传承与民族认同：方洞瑶族追踪调查与再研究》，《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8. 毛宗武、蒙朝吉、郑宗泽：《瑶族语言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1982年。
9. 彭官章：《盘古并非盘瓠》，《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5期。
10. 乔健、谢剑、胡起望：《瑶族研究论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
11. 《瑶族简史》编写组：《瑶族简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83年。
12. 玉时阶：《唐宋羁縻制度对广西瑶族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3. 玉时阶：《白裤瑶社会》，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 玉时阶：《瑶族文化变迁》，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21 玉时阶：《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第2-11页。

15. 玉时阶：《明清时期瑶族向西南边疆及越南、老挝的迁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3期。
16. 玉时阶：《历史的记忆：瑶族传统文化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
17. 玉时阶：《瑶学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与拓展》，《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18. 张有隽：《近代瑶族社会形态再研究》，《广西民族研究》，2005年第3期。
19. 郑立行：《粤北瑶族的氏族社会遗址》，《史学月刊》，1959年第6期。
20. 周光大：《瑶族解放前的社会经济形态》，《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21. 周宗贤：《试论瑶族封建社会形成的特点》，《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

论《华盛顿邮报》对2016年初 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¹

李银波

摘要: 本文考察了《华盛顿邮报》对2016年1月初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 认为这些报道构成该报的一场报道风暴, 并运用文本分析法剖析了这场报道风暴的内容与观点, 探讨了其深度报道和客观报道等主要报道方式与特点, 并从报道框架和词汇色彩等角度揭示出其隐藏在客观性背后的不同倾向性, 最后归纳出该报的特点及该报塑造的3种不同中国经济形象。这对我们深入认识该报及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和中美关系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 美国报纸; 《华盛顿邮报》; 股市风暴; 中国经济; 2016年

作者: 李银波, 教授, 武汉理工大学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新闻与传播系, 主要从事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教学与研究。邮箱: yinbo163cn@163.com

Title: On *The Washington Post's* Report on China's Stock-market Storm at the Beginning of 2016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ing on the turmoil that hit China's stock-market in early January 2016, and argues that these reports themselves constituted a kind of journalistic storm. Using the text-analysis method, I will diagnose the main contents and ideas of these reports, discuss their journalistic techniques, and features such as in-depth and objective report. The paper will uncover the hidden motives behind claims of objectivity through analysing reporting frames and word-tints. This is followed

1 本文为武汉理工大学2017年自主创新研究基金项目《美国报纸关于中国的报道研究》(编号444-20110938)的研究成果。

by a summation of the main traits of this newspaper and the three sorts of Chinese economic images showed by these reports. This paper seeks to provid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the U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 China as well as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in the recent years.

Keywords: The US newspapers; *The Washington Post*; Stock-market Storm; Chinese economy; 2016

Author: Li Yinbo,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 Communcation, School of Law, Humanities &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pecializing in international &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E-mail: yinbo163cn@163.com

2016年元月初中国突发震惊中外的股市风暴。当时中国上海和深圳股市出现暴跌，其间还引入了熔断机制（circuit breaker），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印象十分深刻，而几乎所有的中国股民对此则更是惊心动魄，终生难忘。这场中国股市风暴也冲击世界股市，引起外国媒体的一片哗然和强烈关注。那么外国媒体是如何报道和评价中国的这场股市风暴呢？

《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 1877年创）是一份具有全球影响的美国主流报纸，总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它自称独立报纸，在总体上体现美国主流社会各派别的态度和立场。该报以报道美国国内外政治动态为重点，但国内外经济报道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对中国经济的报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贸易大国和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给美国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因此中国经济发展也受到该报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该报中国报道的重要内容。2016年元月初的这次中国股市风暴当然也成为《华盛顿邮报》的瞩目对象和报道重点。

本文拟考察《华盛顿邮报》对2016年元月初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揭示其内容和观点，探讨其报道方式与特点。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该报的特点及该报塑造的中国经济形象，也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近年来美国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和中美关系。

一、2016年初中国的股市风暴与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风暴

2016年元月初中国上海和深圳股市出现暴跌，世界股市随之出现较大波动，引起全世界媒体的惊慌、警觉和高度关注。本文在此不讨论这场股市风暴本身的任何问题，只考察和分析《华盛顿邮报》对这场股市风暴的有关报道。

这场股市风暴开始于2016年1月4日（星期一），即2016年的第一个股市交易日。当天上海和深圳的股市开盘即走低，而且在巨大的抛盘打压下接连跌破3500点和3400点整数关，跌幅终于在当天中午13点13分达到5%，触发了熔断机制，暂停交易15分钟。股市于13点28分重启后继续下跌，仅过6分钟便在13点34分跌达7%，触发了7%的熔断阈值，交易所立即停止当天交易。上深股市于第二和第三天出现弱势反弹后，于1月7日星期四上午在刚开盘不久便在9点42分达到5%跌幅触发熔断，暂停交易15分钟。股市于9点57分重启后，仅过2分钟跌幅即达7%阈值，当即结束当天交易。由于这场股市风暴明显是于2016年1月1日起实施的熔断机制引起的，因此上海和深圳股市于1月7日宣布停止执行熔断机制，此后上深股市也迅速趋于平稳。根据统计，上海深圳股市于2016年1月4至7日仅仅4个交易日中股票的市值就损失了约5.6万亿元。²

中国这场股市风暴自然也激起《华盛顿邮报》的一场报道风暴³。根据从EBSCO数据库收集的相关资料，《华盛顿邮报》2016年共发表涉华报道222篇，月平均18.5篇，然而仅1月涉华报道就达36篇，为全年最高值，约为平均值的2倍，与平均值相差17.5篇。而除掉1月份，其余月份则波动不大，各月份篇数与平均值相差小于10。

《华盛顿邮报》涉华报道之所以于2016年1月出现报道高峰，就是因为这时其涉华经济报道出现了高峰。在平常月份，该报一般只刊发2篇左右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但仅在2016年1月，

2 佚名：《2016年股市熔断事件回顾》，《新民周刊》，2017年12月8日，见《南方财富网》，网址：<http://www.southmoney.com/caijing/gushipinglun/201712/1817668.html>。取用日期：2019年8月23日。

3 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所言之报道为广义报道，包括新闻与评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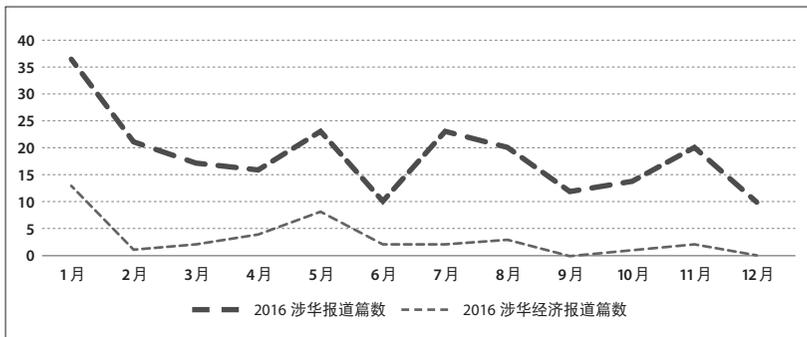
该报发表了 13 篇涉华经济报道。而该报 2016 年全年共发表涉华经济报道 38 篇，月平均 3.17 篇。因此仅 1 月份的涉华经济报道就占全年涉华经济报道的三分之一以上，达 34.2%。

从《华盛顿邮报》2016 年 1 月发表的 13 篇涉华经济报道来看，它们都不是消息，而主要是深度报道或时评。其中只有 1 篇不是关于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其余 12 篇都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报道这场股市风暴。而在这 12 篇有关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中，有 10 篇是于 1 月 8-13 日这 6 天中报道的，占 1 月份涉华经济报道的 76.9%，占全年涉华经济报道的 26.32%。这 10 篇报道构成了关于 2016 年 1 月初中国股市风暴的系列报道。

表 1：《华盛顿邮报》2016 年涉华报道数量统计表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合计	平均
涉华报道(篇)	36	21	17	16	23	10	23	20	12	14	20	10	222	18.5
涉华经济报道(篇)	13	1	2	4	8	2	2	3	0	1	2	0	38	3.17
涉华经济报道占比(%)	36.11	4.76	11.76	25	34.78	20	8.69	15	0	7.14	10	0	17.12	14.43

图 1：《华盛顿邮报》2016 年涉华报道数量统计图



因此可以说《华盛顿邮报》在2016年1月出现了一场对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风暴。这场报道风暴虽然反应较迟钝，于中国股市风暴发生4天后才有反应，但其反应却非常强劲猛烈。本文将主要依据该报于2016年1月8-13日这6天发表的10篇系列报道来进行探讨。下表是《华盛顿邮报》这10篇涉及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的有关信息。

表2：《华盛顿邮报》关于2016年1月初中国股市风暴的10篇系列报道的有关信息

报道编号	J-1	J-2	J-3	J-4	J-5	J-6	J-7	J-8	J-9	J-10
时间	1月8日	1月8日	1月8日	1月9日	1月9日	1月9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2日	1月13日
文体	社论	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	时评	时评/驳论	深度报道	时评	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	争论
是否股市风暴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部分
字数	458	1052	1143	870	1166	733	693	1240	495	591

【说明】报道编号中的J是英文单词January的缩写，编号所代表的报道文章见本文末参考文献。

二、《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内容之解读

从内容上看，该报2016年1月8-13日发表的10篇报道主要包括中国这场股市风暴的新闻事实、原因、结果、影响、对策、评价等方面。

首先，这次股市风暴的新闻事实是这10篇报道必然包含的内容，具体事实经过如前文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这10篇报道中没有一篇是消息，因此没有一篇文章是对2016年1月4日开始的中國股市风暴的及时而详细报道。这10篇报道只或多或少地谈及这些新闻事实，但都非常简略，很不完整。也许美国网络媒体已及时而详细的报道了这一事件，因而时效性较差的报纸就不太注重该新闻的全面及时报道，而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华盛顿邮报》更是如此。

对这次中国股市风暴的原因分析是这些文章的报道重点。有8

篇左右的文章都谈到这次股市风暴的原因，其中有多篇还以大量篇幅来揭示风暴的原因，甚至有一篇文章（【J-2】）专门分析风暴的原因。它们公认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股市不恰当地引入了“熔断机制”，造成投资人恐慌。它们公认的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转入缓慢增长期，增长率由原来2位数降为2014年和2015年的7%左右。有些文章指出风暴的原因是中国经济以生产与出口为驱动的发展模式存在问题，为刺激出口而操纵货币贬值，必然引起股市动荡（【J-1】【J-2】【J-3】）。有些文章指出风暴的更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存在严重泡沫，如债务危机、虚报经济增长率等，股市风暴只不过是泡沫破灭的表现（【J-4】【J-9】）。更有文章将这次股市风暴的原因上升到政治层面，认为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产物，或认为共产党领导人不善管理市场经济，所以出现危机（【J-1】【J-12】）。此外，这些文章还提到一些其它的原因，如中国股民易惊慌易跟风等。

对这次中国股市风暴的结果与影响的分析是这些报道的另一个重点。有4篇文章（【J-3】【J-6】【J-8】【J-9】）专门分析风暴的结果与影响，此外还有多篇文章涉及这次股市风暴的结果与影响。首先，这次中国股市风暴对中国经济是否有影响，在这个方面有两种对立的看法。大多数文章认为中国股市只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这次股市风暴对中国经济不会有很大的冲击。但也有的文章（【J-7】【J-10】）认为这次股市风暴后中国经济将像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一样由高潮走向低谷。但该报更关心的是这次股市风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如【J-3】【J-6】【J-8】【J-9】等4篇文章在这方面的观点基本一致，即中国股市风暴给世界经济带来广泛而严重的冲击，有的将各国（尤其是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都归咎于中国。这些文章说美国和欧洲股市在中国股市的冲击下于同期出现大幅下跌，如【J-6】说美国的Dow Jones和Standard & Poor's在新年第一周下跌6%，而Nasdaq则下跌7%。【J-8】则以南非为案例说明澳洲、亚洲、非洲和拉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因为中国的经济衰退而出现出口下降、货币贬值、经济凋零、失业和社会动荡等问题。

有多篇文章提出了治理这次股市风暴以及中国经济衰退的对策。这些对策主要包括：改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由投资和出口型

转变为消费与服务型；放弃货币贬值措施，紧缩和强化人民币；放弃执行五年计划与规定经济增长目标；实行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扩大政治和经济自由，等等。

然而这些文章的观点不一，甚至完全相反，而有些文章本身就包括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如大多数文章认为中国股市风暴既是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病态的表现。但【J-5】则说这些是对中国经济的误解，认为中国股市主要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不能代表中国经济的全部，因此不能反映中国经济整体上陷入病态。文章【J-10】则提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说中国股市风暴于上海塔落成之日爆发，因此认为世界最高建筑的建造是一个国家经济由盛转衰的标志；而另一种观点则通过研究发现世界最高建筑的建造与该经济转衰没有必然联系；但文章作者没有表示支持其中某一方。

然而所有这些文章都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放慢是必然的，其增长放慢将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不良影响。

三、《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方式之剖析

从该报关于中国股市风暴的10篇报道文章来看，该报的报道方式具有以下两点鲜明特征。

（一）以深度分析为主

如前文所述，在这10篇报道中，竟然没有一篇是消息，它们主要是深度报道和时评，其中含5篇深度报道、3篇时评、1篇社论，另外还有1篇是带时评性的争论文章。从这10篇文章来看，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其报道非常深入，不是停留在叙述新闻事实层面，不满足于新闻5W要素的提供，而是探求新闻事实背后的原因、本质、结果、影响或对策等，并以深层次的分析为文章的主要内容。因此这些文章的篇幅都比较长，所有文章的字数都在450字以上，其中有4篇在1000字以上。

从上文的内容解读部分可以看出，这些文章在原因分析方面，既有经济因素，如货币与汇率问题、经济发展模式问题、产业结构问题、投资商与股民问题等，又有政治因素，如官员管理经济的能

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与商业经济的相容性问题、政治与经济民主问题等，还有社会因素，如中国股民的特点、中国劳工特点等。在结果与影响的分析方面，既有对中国的影响，也有对全世界经济的影响，既有对各国股市的影响，也有对各国货币、贸易、就业、社会安定、政府机构的影响。在现象与本质的分析方面，由中国股市的危机出发，走向怀疑中国官方公布的年度经济增长率数据的真实性，到怀疑中国整个经济出了毛病，再到怀疑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危机。这些分析可谓挖掘得真是够深够远。很明显，有些地方挖掘得太远太深，不仅显得多余，甚至也显得荒唐，变得牵强附会，背离了真实性原则。如【J-1】将股市危机与中国的政治自由度挂勾，还有【J-10】将上海塔的落成与股市风暴及中国经济衰落挂勾，显得风马牛不相及。

（二）运用了客观报道手法

该报关于中国股市风暴的这 10 篇报道文章，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评论，都运用了客观报道手法。其表现为这些文章大都包含有大量的数据、例子与案例、言论引述、对比等，观点都有大量的事实支撑。有的文章还不持立场，显得中立。

该报道中国和美国的股市自然要以数据说话，每天股市的跌幅是以百分数表达。除股市外，经济的许多方面也都要数字表达，如中国经济的年度增长率、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货币汇率及其涨跌、GDP、贸易额等。

举例子（包括重点案例）也是该报报道这次中国股市风暴的重要手段。如在报道中国股市风暴对世界股市的影响时，多次以美国三大股市为例进行说明。【J-8】在报道中国股市风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时，还举例了世界各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冲击情况，如美国一家铝业公司破产，俄罗斯和沙特的石油价格下跌、收入锐减，澳大利亚矿物出口和印度尼西亚的煤炭出口骤降，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巴西的失业率上升，等等。案例虽然用得极少，但也引人注目。【J-8】在文章最后就以南非为案例说明中国股市风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说南非矿物主要出口到中国，因受 2016 年 1 月 11 日（星期一）中国股市再次骤降的影响，当天南非货币“兰特”（rand）的价值相对于美元下降 10%，南非货币的购买力和债务偿还力也因此下降，这加重了南非因干旱引进粮食的困难，也加重了

南非此前出现的财政困难，财政部长被更换，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南非的信用级别降为 BBB-。

该报在报道这次中国股市风暴时，不论是深度报道还是时评，还较多地引用他人的言论以表达作者或社会各界对这次股市风暴的看法。在这 10 篇报道中，有 8 篇包含引用言论，平均每篇 3.9 人次，绝大多数都是带引号的直接引用，其中【J-3】引用最多，达 9 人次。从这些被引者的身份看，他们有中外国家领导人或政治要人，如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官员、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等；但更多的则是经济界的专业人士，如全球投资巨擘索罗斯（George Soros）、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专家、美国 Standard & Poor 公司的全球经济专家、深圳 Longteng 资产管理公司总裁、上海华兴证券公司分析师、IG 证券公司分析师、美国康奈尔大学教授、Peterson 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资本经济”研究所专家、IHS 全球洞悉公司经济专家、新加坡商业银行经济专家、南非银行首席经济专家等等，他们遍布世界各地。这些文章引用他们的发言以试图表明这次股市风暴的影响广泛而强烈，同时也试图表明各篇报道的内容和观点是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客观的。

**表 3：《华盛顿邮报》关于 2016 年 1 月初
中国股市风暴的 10 篇系列报道的引言统计**

报道 编号	J-1	J-2	J-3	J-4	J-5	J-6	J-7	J-8	J-9	J-10	合计
引言 数量	1	0	9	8	5	7	0	6	2	2	40
正面 引言	0	0	0	1	0	2	0	0	0	1	4
中性 引言	0	0	4	1	0	1	0	5	1	0	12
负面 引言	0	0	4	5	5	2	0	1	1	1	19
非评价 言论	1	0	1	1	0	2	0	0	0	0	5

【说明】此处的引言指各篇报道中被采访人物的言论或转引的言论，含带引号和不带引号的引言。引言的数量由作者人工统计，每出现一处算一次引言。

有的文章引用一些与自己一致的言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如【J-4】。也有的文章先引用一些作者认为是错误的观点，然后

一一进行驳斥，如【J-5】，但这种反向引用毕竟占极少数，在这10篇文章中仅有2篇是这种情况，占20%。对于这些带倾向性的文章，该报有时将观点各自不同甚至对立的几篇文章排在一起发表以形成争鸣，如1月9日同时发表的【J-4】与【J-5】的观点是对立的，这表明该报出版商或栏目编辑欲表现出对事件持独立或中立的立场，不偏向某一方。有时一篇文章包括几种各自不同甚至对立的观点，则表明该文章作者欲表现出对事件持独立或中立的立场，如【J-6】【J-10】。独立性或中立性也是该报使用的客观性手法。

四、《华盛顿邮报》对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倾向之诊断

尽管该报采用了客观报道手法，但有些报道往往不一定能得出客观的结论，而是得出带有偏见和倾向性的结论。这既与事件本身的性质有关，也与这些报道者所采用的立场和态度有关。于2016年1月初发生的中国股市风暴本身是一场灾难，而且对世界经济特别是世界股市产生了较大冲击，事件本身带有负面性，因此《华盛顿邮报》是不可能对这场灾难进行褒扬的，而对其进行原因和影响的分析并表示担忧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因而这些文章的观点和评价也大都负面的。另一方面，这些报道的态度或者说作者的态度往往也带有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也会影响其报道的方式和结论。同样是灾难，作者是幸灾乐祸的、同情理解的、还是漠不关心的，或者是说是恶意的、友好的、还是中立的，报道显示出的倾向性是不一样的。

本文在此拟对这些报道中体现的作者或编辑的态度倾向进行考察。为了表述方便，本文将这些报道的态度倾向分为“负面态度”、“正面态度”和“中性态度”三类。“负面态度”指报道对中国这次股市风暴进行嘲讽和幸灾乐祸，对中国的党和政府及社会制度表示怀疑和否定的态度。“正面态度”指报道对中国这次股市风暴给予同情和理解，对中国的党和政府及社会制度表示肯定和赞赏的态度。“中性态度”指报道如实地叙述和评价这次股市风暴并合理而客观地分析其原因与影响的态度，或是报道将正反两方的观点并列呈现而不加评论所体现的态度。这些态度倾向性在文章的报道框架和词汇色彩上可体现出来。

表 4: 《华盛顿邮报》关于 2016 年 1 月初
中国股市风暴的 10 篇系列报道的框架、词汇色彩与态度倾向

报道编号	报道框架	负面词汇	中性词汇	正面词汇	态度倾向
【J-1】	中国政治	governed by a single party (一党专制), ham-fisted (愚笨的), oppose democracy (反民主), confused system (混乱体制)	plunge (暴跌)		负
【J-2】	中国政治	backfired (玩火自焚的), punished (遭到惩罚的)	recession (衰退)		负
【J-3】	中国经济: 减速		slowing (减速的), bubbles (泡沫), unhealthy (不健康的)		中
【J-4】	中国政治	red dragon (赤龙), trick (欺诈), gaping wounds (裂开的伤口), downfall (衰败), worse (更糟), exaggerations (夸大), overstated (夸大的), make-believe (伪造的), fiddling (摆弄, 伪造), unreliable (不可靠的),	turbulence (动荡), sinking (下降的)		负

报道编号	报道框架	负面词汇	中性词汇	正面词汇	态度倾向
【J-4】	中国政治	conspiracy (阴谋), haphazard (随意的), errors (错误), unfortunately (不幸地), hurt (损害)			负
【J-5】	中国经济: 正常			misunderstood (误解), misconceptions (错觉), overall health (整体健康), fairly well (相当好), rising (上升的), more sophisticated (更精致的), higher technological (技术更高的), not underhanded (并不卑劣), reasonable (合理的)	正
【J-6】	世界股市	meltdown (崩溃), worst (最坏的)	limited (有限的), tenuous (微弱的)	restored (恢复了的)	中
【J-7】	中国经济: 没落	turmoil (混乱), meltdown (崩溃), collapse (崩溃), dictatorial (独裁的), fall (崩溃, 失败)	dropping (下降)		负

报道编号	报道框架	负面词汇	中性词汇	正面词汇	态度倾向
【J-8】	世界经济	mayhem (骚乱), biggest threats (最大威胁), painful (痛苦的), paying the price (得到报应)			负
【J-9】	世界股市		slowdown (减速), dropped (下降)		中
【J-10】	中国经济: 没落 / 正常	tanked (彻底失败), testament (遗嘱), fall (崩溃, 失败), breakneck (亡命的)	plunged (暴跌)	not doom (非厄运), no relation (【股市风暴与建摩天楼】没有关系)	中

【说明】此表是根据 Opinionfinder 词库进行情感色彩分类的。对个别词库中没有的词汇，作者酌情对其进行了分类。

(一) 不同的报道框架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倾向性

该报关于这次中国股市风暴的 10 篇文章，无论是深度报道还是评论，都较明显地存在报道框架。由于这些文章主要是深度报道和时评，都倾向于深度分析，挖掘中国股市风暴的原因、实质和影响，因此必然会将这次股市风暴置于一定的框架之中来透视其意义。而每篇文章使用的框架不同，不仅所透视和呈现的意义不一样，表现出的态度倾向也不一样。

该报关于中国股市风暴的 10 篇文章主要使用了两类框架，即“中国框架”和“世界框架”。该报在报道中国股市风暴的原因与实质时采用的是“中国框架”，即将这次股市风暴放在中国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进行考察的框架。而在报道中国股市风暴的结果与影响时，该报采用的主要是“世界框架”，即从世界市场背景来考察这次股市风暴。

“中国框架”又包含“中国政治框架”和“中国经济框架”。

“中国政治框架”主要从中国政治背景来考察这次股市风暴，如中国的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和经济政策等。例如【J-1】认为这次股市危机的根源在于中国的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和缺乏民主的政治制度，其解救方法是扩大内需和实现政治经济自由等。

【J-2】和【J-4】还认为这次股市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的错误经济政策措施，如制订五年规划、虚报年度经济增长率、出台熔断机制、操纵人民币汇率等。这种报道框架的态度倾向一般是负面的、不友好的，甚至有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中国经济框架”则主要从中国经济背景来考察这次股市风暴，它又包含 3 种不同框架。

第一种是“中国经济没落框架”，认为中国经济正走向没落和崩溃，并以此为背景来考察这次股市风暴。如【J-7】认为中国经济将象上世纪 80 年代末的日本经济一样由高潮走向低谷，这次股市危机只是其崩溃的表现。【J-10】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其一也是如此。这种报道框架的态度倾向一般也是负面的、幸灾乐祸的。

第二种是“中国经济减速框架”，认为中国经济在实现结构转型，而且还存在泡沫和失误，因此经济发展变慢，并以此为背景进行考察。如【J-3】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从制造与出口型转向消费型，发展速度由原来的两位数降为 2014 年的 7%，政府的熔断机制

及货币政策触发了这次股市风暴，但政府很快纠正了错误做法，于是股价在2016年1月8日星期五又有回升。这种报道框架的态度倾向显得较客观中立，偏见较少。

第三种是“中国经济正常框架”，认为中国经济运转正常，并以此为背景进行考察。如【J-5】驳斥了美国流行的5种对中国经济的误解，认为中国股市仅代表中国的制造业和建筑业，其总价值只占中国GDP的三分之一，因此这次中国股市风暴不能表明中国经济整体上是病态的；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只是出口廉价商品，更重要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人民币的汇率是相对浮动的，中国政府并没有操纵人民币；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是基本可信的，中国并没有虚报这些数据；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比重极小，不会威胁美元的国际地位。该文的态度明显是正面的，也很友好，显得较乐观、充满信心。作者明显对中国经济有较深的接触和了解。尽管该文好像是在替中国辩护，但作者仍是站在美国利益的基本立场上的。

“世界框架”主要包含两种具体框架，即“世界股市框架”和“世界经济框架”。

“世界股市框架”仅以世界股市为背景来考察这次中国股市风暴的影响，很少涉及股市以外的因素。如【J-6】认为美国三大股市在2016的1月4-8日出现大幅下跌，主要是中国股市风暴引起恐慌的结果，其实它们与中国股市的联系并不大；【J-9】报道说中国股市在2016的1月11日星期一又出现大幅下降，但欧美股市却不受影响。这一框架的态度倾向显得较客观中立。

而“世界经济框架”则以更广泛的世界经济为背景来考察，如【J-8】广泛考察了这次中国股市风暴对各大洲许多国家的经济带来的多方面冲击，将各国在出口、物价、就业、粮食和能源、货币等方面的问题，甚至一些国家出现的社会安定、政府稳定方面的问题，都归因于中国的股市风暴及经济减速。这一框架严重夸大中国股市风暴给世界经济政治带来的灾难。如南非的粮食危机主要是由于南非出现干旱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中国从南非的进口减少造成的。这一框架很不客观，而且居心不良，试图恶化中国与其它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煽动世界的反华情绪，因此其态度倾向明显是负面的。

这些报道框架的使用，归根结底还是由作者的政治立场和经济

利益决定的。

(二) 不同的词汇色彩也可显示出不同的态度倾向性

上述这3种态度倾向也通过这些文章中的“负面词汇”、“正面词汇”和“中性词汇”体现出来。

“负面词汇”指带有贬义的词汇，主要体现在这些文章关于中国政府与制度和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方面。涉及中国政府与制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使用的负面词汇，如【J-1】：ham-fisted、a single party、opposes democracy、control、contradictions within their confused system。而对中国经济的描述大部分也是负面词汇，尤其是采用“中国经济没落框架”者。如【J-2】用 backfired、punished 等形容中国经济；【J-7】用 turmoil、collapse、meltdown、fall 等形容中国经济。【J-4】用 gaping wounds、turbulence、downfall、worse 形容中国经济，说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尤其是经济增长率是 tricked、exaggerations、overstated、make-believe、fiddling、unreliable、conspiracy、haphazard、errors、unfortunately、hurt 等。些词汇不仅表现出怀疑、否定和嘲笑，甚至还幸灾乐祸，因此呈现的是负面态度倾向。

“正面词汇”带有褒义，主要集中在【J-5】中，该文试图消除美国读者对中国经济的一些误解，针对这些误解谈了一些较客观甚至积极的看法，有明显的正面态度倾向，使用的正面词汇也多一些。例如：说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存在 misunderstood、misconceptions；说中国经济是 overall health & fairly well，说中国工人的工资 rising，说中国的产品 more sophisticated & higher technological，说中国货币 not underhanded，说中国的经济数据及增长率 reasonable 等。

从词汇角度看，中性态度使用“中性词汇”表达的并不多。带有较明显的中性词汇者，如【J-3】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使用了 slowing、bubbles、burst、unhealthy 等词；【J-9】说中国经济 slowdown，中国股市 dropped；【J-6】说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及世界经济的关系是 limited、tenuous，等。中性态度主要是通过正面观点和负面观点并置的方式来表达的，因此一文中往往既有正面词汇，又有负面词汇，如【J-6】关于中国股市的报道既有 meltdown 等负面词汇，又有 stabilized、restored 等正面词汇。中性态度主要

体现在关于中国股市风暴及中国经济的报道方面。

词汇色彩是与分析框架紧密联系的。“负面词汇”集中出现在使用“中国政治框架”和“中国经济没落框架”的文章中，而“正面词汇”则集中出现在使用“中国经济正常框架”的文章中。“中性词汇”虽然不多，但主要体现在采用“中国经济减速框架”的报道中。

根据对报道框架和词汇色彩的分析，该报关于中国股市风暴的10篇文章有5篇为负面倾向，4篇为中性，正面倾向仅1篇，负面倾向者远远多于正面倾向者，因此该报的独立性或中立性并不突出。

五、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华盛顿邮报》作为美国一份历史久而具有世界影响的主流报纸，它对2016年初的中国股市风暴也发起了一场报道风暴。《华盛顿邮报》的这次报道风暴既体现了美国报纸的共性，也体现了其独特的个性。从共性来看，它体现了美国的主流新闻价值观，也体现了美国大多数媒体所标榜的客观、中立的新闻与言论原则。如美国媒体认为越反常的事件越具有新闻价值，该报对中国这次股市风暴如此大张旗鼓地加以报道，充分体现这一点。而该报标榜的客观性、中立性，则体现在其对中国股市风暴的报道中大量运用数据、实例、引征、对比等手法。但与美国其它报纸如《纽约时报》等相比，《华盛顿邮报》的中立性似乎做得更到位一些。从个性来看，深度报道是该报最突出的特点，其报道不注重呈现中国股市风暴的新闻事实，而是注重对新闻事件的原因和影响等进行多角度地深入挖掘。这一特点可谓该报在历史上形成的令美国报业同行敬佩的传统，该传统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初由该报发起并领导的对“水门事件”丑闻的揭露，最终导致美国时任总统尼克松辞职，该报从此名声大振，也从而形成了其以政治报道为主以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见长的独特传统⁴。

尽管该报从表面上看具有客观性、中立性的特点，但具体到各

4 The Washington Post (2010). "Walter Reed and Beyond". *The Washington Post*, 05/25/2010.

文章时，大多数文章还是有态度倾向性的，包括正面、负面和中性态度倾向，且带负面倾向的文章或观点远远多于带正面倾向者。由于该报 10 篇系列报道对这次中国股市风暴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倾向，该报所呈现出的中国经济形象也各有不同。第一种形象是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并走向崩溃和没落，这次股市风暴只是一个症状而已，有的甚至错误地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政党和政府体制。这是该报呈现的主流中国经济形象。第二种形象是中国经济在减速，而中国政府的一些措施也有失误，因此导致一些不良反应，但中国经济仍在较快发展，股市只是中国经济的一小部分，因而股市风暴不会影响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第三种形象是中国经济各方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股市风暴也只是小问题而已，美国人对中国经济存在很多误解。但这一观点只占极少数。

总之，《华盛顿邮报》对 2016 年初中国股市风暴的系列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该报和美国媒体以及它们如何报道中国的极佳窗口，也为我们认识美国媒体和民众的对华态度、认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提供了良机。通过对这些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很多启示。

参考文献⁵

1. Allan Sloan: The myth of China's economic miracle. *The Washington Post*, 01/12/2016. 【J-7】
2. Ana Swanson: A red dragon that tricked the world with treasure licks its gaping wounds. *The Washington Post*, 01/09/2016. 【J-4】
3. Ana Swanson; Kevin Sieff: China's financial mayhem resounds. *The Washington Post*, 01/12/2016. 【J-8】
4. Emily Rauhala; Renae Merle: China's stock slide shows no signs of slowing. *The Washington Post*, 01/12/2016. 【J-9】
5. George F.: China's flawed ascent. *The Washington Post*, 01/21/2016. 【J-12】

5 各参考文献末方括号中的代码是该文献在本文中的编号，编号中的 J 是英文单词 January 的缩写，编号的顺序是报道时间的先后。编号的目的是为了叙述方便。

6. Matt O'Brien: The real problem in China is bigger than the stock market. *The Washington Post*, 01/08/2016. 【J-2】
7. Matt O'Brien: China won't be able to borrow its way out of this economic rut. *The Washington Post*, 01/20/2016. 【J-11】
8. Renae Merle; Simon Denyer: Global markets cap a week of turmoil. *The Washington Post*, 01/09/2016. 【J-6】
9. Simon Denyer, Ylan Q. Mui: China's market turmoil spreads. *The Washington Post*, 01/08/2016. 【J-3】
10. The Washington Post: Gyration in China. *The Washington Post*, 01/08/2016. 【J-1】
11. The Washington Post: China's economy. *The Washington Post*, 01/09/2016. 【J-5】
12. The Washington Post: Made in the USA - mostly. *The Washington Post*, 01/30/2016. 【J-13】
13. Ylan Q. Mui: Do tall buildings foreshadow economic doom? . *The Washington Post*, 01/13/2016. 【J-10】

汉语母语者对双字名词的非线性识别¹

丁彧藻

摘要: 文字词识别的顺序是语言识别、习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词形匹配任务下操纵汉字单元变量发现汉语母语者在双字名词的识别过程中, 首字相同或尾字相同条件均比其他条件的反应时显著延长, 出现了文字词识别中的抑制效应。这种现象不能够用线性序列加工的方式加以解释, 符合跟踪模型^{2,3}的预测, 与英语的词项识别认知机制一致。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双字名词的识别过程中, 被试成功解析出汉字单元, 且汉字单元和整词的语境信息之间发生紧密的互动。本实验为汉字单元和整词单元在汉语合成词阅读教学中均需重视提供了心理科学依据。

关键词: 反应时; 非线性识别; 双字名词; 抑制效应; 词形匹配

作者: 丁彧藻, 副教授, 福建商学院海外教育学院, 研究兴趣: 理论语言学、神经语言学。邮箱: sandinny@126.com

Title: Non-linear Recognition of Two-character Nouns by Native Speakers of Chinese

Abstract: The order of orthographic word recognitio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language recognition and acquisition. By rearranging the variable of Chinese character uni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reaction time

-
- 1 基金项目: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汉语母语者和非母语者中文双字词识别机制的脑电研究”(FJ2019B161)。
 - 2 McClelland, J. L., & Elman, J. L.: The TRACE model of speech percep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18), 1986, pp.1-86.
 - 3 Norris, D., & McQueen, J. M.: Shortlist B: A Bayesian model of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 2008, pp. 357-395.

in the word-initial or word-final character identity condition in the visual word-matching task was significantly longer than those in the other conditions, producing inhibitory effects on the recognition of two-character nouns. This phenomenon is not attributed to the serial processing of characters in the synthetic words. Rather i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Trace Model^{4,5}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recognition of English words.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articipants successfully parsed individual character units, and the word contextual information interacted with individual character units in the two-character nouns recognition. The current experiments provide psycholog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proposal that much weight is attached to both individual character units and whole word unit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synthetic words.

Keywords: reaction time; non-linear recognition; two-character nouns; inhibitory effect; word matching

Author: Ding Yuzao,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Overseas Educational School,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and neurolinguistics. Email: sandinny@126.com

一、前言

符号识别的顺序一直是语言学家、认知心理学家和语言习得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Saussure⁶曾经指出,符号的线性受到时间的一维属性的制约,而且这一属性和语言的任意性同样重要。书面语言作为符号的一种实现形式,虽然与口头语言使用的媒介不同,也需要按照一定的线性顺序排列,对书面语学习者的阅读习惯和提取信息的方式产生了一生的影响,例如现代中文、英文和日文一般是按照从左向右的顺序排列,而维吾尔文、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则是按照从右向左,尽管英文和维吾尔文等均是表音文字,中文是意音文字,而日文除了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这样的

4 同2。

5 同3。

6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72/2001, pp.69-70.

音节文字，还吸收了大量的汉字。文字类型和文字排列方向是两个独立的变量。但是文字词内部成分排列的顺序却是单向的，具有明显的社会规约性。字序对现代汉语的构词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古代汉语以单字词为主，而现代汉语却是以双字词为主⁷。双字词构造必然涉及到两个字的排序问题。在双字词中汉字排列的顺序不同，词的意义就可能完全不同，如“大人—人大”“上海—海上”“科学—学科”“山东—东山”“子女—女子”“语言—言语”“人类—类人”“产生—生产”“对面—面对”的对立。有些词即使意义相近，如“相互—互相”“争斗—斗争”“蔬菜—菜蔬”“讲演—演讲”“觉察—察觉”“替代—代替”“累积—积累”，也有使用语境和意义的细微差异。这自然引发我们思考：汉语合成词中汉字排列的顺序与大脑对其识别的顺序是完全相同的吗？文字词识别的顺序问题一直充满着争议。基于字母文字提出的鬼域模型（pandemonium model）⁸认为阅读者每次只能以序列的方式加工一个字母。Libben⁹认为英语字母从左向右组合，直到发现一个有意义的单位。Tydgate 和 Grainger¹⁰指出有证据显示视觉词的识别存在一点序列加工的成分，字母串中的首字母具有识别的优势。一些对汉语的研究也显示汉语母语者采用了串行的加工方式。张学新等人¹¹在脑电实验中发现双字词的首字较之尾字对整词加工更为重要，认为两个单字没有受到平权的并行加工，或者说双字词的识别包含从首字到尾字的串行加工。张兰兰¹²的命名任务结果表

7 周荐：《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中国语文》，1999年第4期，第304-309页。

8 Selfridge, O. G.: Pandemonium: A Paradigm for learning. I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the mechanization of thought process*.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1995, pp.511-526.

9 Libben, G.: How is morphological decomposition achieved? *Language & Cognitive Processes*, (9), 1994, pp.369-391.

10 Tydgate, I. & Grainger, J.: Serial position effec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etters, symbols, and digi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 2009, pp.480-498.

11 张学新、方卓、杜英春、孔令跃、张钦、邢强：《顶中区 N200：一个中文视觉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科学通报》，2012年第5期，第332-347页。

12 张兰兰：《汉语阅读过程中心理词加工机制的实验研究》，博士学位论

明被试识别汉字的顺序大致为从左向右，识别的效率随之降低。然而研究显示汉语阅读的知觉广度大约是 4-5 个汉字^{13,14}，以双字词呈现时到达大约 6 个汉字¹⁵。这表明汉语读者在书面语言感知阶段也采用并行的方式提取每个汉字的视觉物理特征，并不像口语那样受到严格的时间一维属性的制约。汉字的并行加工也得到证据的支持。Li 等人¹⁶对四字词的汉字识别模式研究显示汉字的识别是并行加工，只是由于注意的限制加工的效率从左向右递减。张兰兰¹⁷采用快速呈现—命名任务考察四字心理词发现，汉字的识别在一定的程度上也具有并行特征。先前这些采用不同技术、不同任务、针对不同类型文字和被试所发现的文字词加工顺序不尽一致，有时甚至矛盾对立，我们难以凭直觉判断哪种识别策略才是学习者真正采用的。因此只有通过更多的实验加以验证，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分析，给出合理的解释，而不能用一种统一的理论模式来解释所有文字词的加工。

基于这样的考虑，本实验严格控制词性变量和词的长度，选择汉语双字合成名词作为研究对象，以汉语母语者为被试，设计了两个完全形式导向的实验任务 A 和 B，操纵了汉字单元变量和语义变量，均是让被试判断双字名词的首词和目标词是否完全相同，将被试的注意焦点导向双字名词的词汇形式信息的加工，避免一些实验中采用语义判断任务引起的其他变量的干扰。

文，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12年，第50页。

- 13 Inhoff, A. W., & Liu, W.: The perceptual span and oculomotor activity during the reading of Chinese sent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4), 1998, pp.20-34.
- 14 闫国利、王丽红、巫金根、白学军：《不同年级学生阅读知觉广度及预视效益的眼动研究》，《心理学报》，2011年第43期，第249-263页。
- 15 王丽红：《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的眼动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01年，第51页。
- 16 Li, X. S., Rayner, K., & Cave, K. R.: On the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words during read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58), 2009, pp.525-552.
- 17 同12，第50页。

二、实验 A 研究方法及结果

1. 被试

23名(10男/13女)健康大学生自愿有偿参加了本实验,均为右利手,年龄在21-30岁(平均:24.74岁,SD=2.58)。母语均为汉语,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被试实验前均阅读并签署由北京大学中文系科学研究与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的知情同意书。被试坐在光线暗淡的隔音室的椅子上,面对17英寸液晶显示屏,视距约80cm。关键刺激出现在屏幕中心,视角朝向大约为 $2.5^{\circ} \times 1.9^{\circ}$ 。要求双眼注视屏幕中央的注视点。

2. 材料

实验设置了四种关键条件:(1)真词对照条件:首词和目标词都是真词,并且首词和目标词在读音和字形上完全不同,语义不相关,如“刀子-老伯”;(2)语义相关条件:首词和目标词是语义上相关的名词,并且在读音和字形上完全不同,如“大爷-老伯”;(3)首字相同条件:首词和目标词的首字相同,属于同一个语义场,如“老者-老伯”;(4)重复条件:首词和目标词相同,如“老伯-老伯”。每个关键条件各70个试次。填充试次是由各种类型的名词构成,并且启动词和目标词在词形上相同,共140个试次。每个刺激词项均为双字名词。刺激材料及出现次数信息均来自语料库在线字词索引(<http://www.cncorpus.org/wdindex.aspx>)。

四种关键条件下的首词之间做到了出现次数和笔画数(真词对照:59.21, 12.84;语义相关:57.87, 13.37;首字相同:58.76, 12.43;重复:58.06, 12.76)的匹配($F(3, 207)=0.006, p>.99$; $F(3, 207)=.63, p=.6$)。

我们请15位不参加实验的大学生用5点量表给各条件首词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相关度评分(1表示完全不相关,5表示完全相关),均值为:真词对照:1.17;语义相关:3.28;首字相同:2.88。统计分析显示语义相关度的主效应($F(2,138)=191.31, p<.000001$)。也请这些同学给首字的有意义程度评分(1表示完全无意义,5表示完全有意义),平均值为3.39(SD=.45),说明这些首字有较高级别的意义。

3. 程序

每个试次包括一个固定十字、一个首词、一个目标词。试次之间的间隔 (ITI) 为 1000ms。在实验开始时屏幕中央呈现 500ms 的黑色十字, 接着呈现首词, 时间持续 500ms。刺激之间的间隔为 500-700ms。目标词呈现 500ms, 之后是 1200ms 的空白屏幕。被试在看到目标词时做按键反应。如果首词和目标词整词形式完全相同, 则按 1 键, 不同则按 2 键。反应和键的匹配在被试间平衡。在刺激材料呈现时, 每种类型的试次进行随机混合。反应时为从目标词呈现的起始到按键反应起始的时间。实验流程和刺激用 E-Prime 2.0 控制。

4. 实验 A 的行为结果

四种条件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及正确率见表 1。对于反应时,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条件的主效应 ($F(3,66)=16.23, p<.0001$)。后续的比较显示重复条件分别比真词对照条件、语义相关条件和首字相同条件下的反应时显著性更短 ($ps<.05$)。首字相同条件也分别比真词对照条件和语义相关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性更长 ($ps<.01$)。对于正确率,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条件的主效应 ($F(3,66)=3.18, p<.05$)。后续的分析显示真词对照条件比首字相同条件的正确率显著性更高 ($p<.05$)。语义相关条件与首字相同条件正确率的差异也达到显著 ($p=.05$)。

三、实验 B 研究方法及结果

1. 被试

19 名大学生有偿参加了实验, 均为右利手, 年龄在 19-27 岁 (平均: 21.68, $SD=2.71$)。其他实验条件与实验 A 相同。

2. 材料

实验设置了四种关键条件: (1) 真词对照条件: 首词和目标词都是真词且字形和读音均不相同, 语义不相关, 例如“彩虹—中国”; (2) 语义相关条件: 首词和目标词都属于同一个语义场, 但是字形和读音均不相同, 例如“日本—中国”; (3) 尾字相同

条件：首词和目标词属于同一个语义场，且含有共同的有意义的尾字，例如“美国—中国”；（4）重复条件：首词和目标词是同一个真词，例如“中国—中国”。每个关键条件各 60 个试次。填充试次是由各种类型的名词构成，并且启动词和目标词在词形上相同，共 120 个试次。双字词刺激材料及出现次数信息同样选自语料库在线字词索引。实验 B 和 A 没有相同的刺激词对。

四种关键条件下的首词之间做到了出现次数和笔画数（真词对照条件：63.47, 17.46；语义相关条件：63.1, 17.15；尾字相同条件：63.8, 17.55；重复条件：63.25, 17.53）的匹配（ $F(3,177)=.0004, p>.99$ ； $F(3,177)=0.59, p=.62$ ）。

我们请不参加实验的 15 位大学生运用 5 点量表给真词对照、语义相关、尾字相同三种条件的首词和目标词的语义相关度评分，均值为：真词对照：1.25；语义相关：3.44；尾字相同：3.90。统计分析显示语义相关度的主效应（ $F(2, 118)=727.15, p<.0001$ ）。也请这些同学运用 5 点量表给尾字相同条件下的尾字有意义程度评分（1 表示完全无意义，5 表示完全有意义），平均值：4.36（ $SD=0.30$ ），说明这些尾字有较高级别的意义。

3. 程序

刺激呈现的程序与实验 A 相同。

4. 实验 B 的行为结果

四种条件正确反应的反应时及正确率见表 1。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反应时存在条件的主效应（ $F(3, 54)=7.5, p<.01$ ）。进一步比较显示尾字相同比真词对照、语义相关和重复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性更长（ $ps<0.05$ ），后三种条件没有显著性差异，但是重复条件的反应时最短。各条件的正确率无显著性差异（ $F(3, 54)=1.04, p=.38$ ）。

表 1: 实验 A 和 B 四种条件下的反应时 (ms) 和正确率

条件	实验 A		实验 B	
	反应时 (SD)	正确率 (SD)	反应时 (SD)	正确率 (SD)
真词对照	556.62 (109.38)	.98 (.02)	657.06 (162.90)	.98 (.02)
语义相关	563.81 (118.09)	.98 (.02)	650.83 (166.41)	.99 (.02)
首 / 尾字相同	590.52 (111.42)	.97 (.03)	675.82 (163.26)	.99 (.02)
重复	525.94 (115.48)	.98 (.03)	636.33 (169.69)	.98 (.02)

四、讨论

(一) 基于组群模型对实验 A 的解释

就反应时而言, 实验 A 和 B 存在共同之处。首先, 重复条件下的反应时是最短的, 再现了行为反应中的重复效应¹⁸, 说明重复条件有利于目标词形式的识别; 其次, 首字或尾字相同均比其他条件的反应时显著更长, 出现了双字名词识别中的抑制效应, 说明首字或尾字相同给目标词的词形识别带来了更大困难。就正确率而言, 实验 A 中的首字相同条件正确率最低, 反映了词形加工的困难, 与其反应时的行为表现一致, 但是在实验 B 中, 各条件却无显著差异。

Marslen-Wilson & Tyler¹⁹ 曾提出组群模型 (cohort model) 用来解释口语词的识别。这种模型假设口语加工是从听者认定的单词开始的声音或音素开始的。当初, 由于不是所有知觉的信息都可以获取, 不止一个表征符合知觉系统输出的初始部分, 因而不止一个表征被激活。在词形的表征过程中, 最符合感觉输入的那个就被选择出来。组群模型就是考虑到了口语词的时间一维属性。组群模型也被用来解释听觉词识别中发现的首音节相同条件反应时更长的现

18 Huang, X., Yang, J., Chang, R. & Guo, C.: Task modulation of disyllabic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unimodal ERP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19 Marslen-Wilson, W., & Tyler, L. 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8), 1980, pp.1-71.

象²⁰和形态激活音系效应^{21,22}。组群模型与文字词识别中的鬼域模型具有相似之处,均强调了词加工的线性序列属性。考虑到字的线性顺序在现代汉语构词时的突显作用,如现代汉语中许多双字名词含有共同的有相同意义的尾字,成为词的语义核心,内部结构可以概括为“义象+义类”²³,例如,“中国、美国、德国、法国、英国、俄国、泰国、韩国”,因而用串行的方式解释汉语母语者加工这些双字名词似乎不会遇到什么困难。此外,假设语言使用者总是最大化地使用两条通路来加工语言信息^{24,25}。读者也可以在文字词识别时通过默读的方式激活语音通路,利用词的音系信息时间上的线性属性来帮助识别词形。实验A发现首字相同条件下的反应时是最长的,用串行加工方式来解释双字名词中字的识别顺序能得到合理的说明:在首字相同条件下,当目标词的第一个字被感知,一组具有相同首字的候选词被同时激活,这些候选词之间相互竞争,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加工,判断词的身份,直到第二个字被感知,目标词才能被确定。这样被试开始可能认为首词和目标词在正字法上相同,做出形式一致的判断,但是当第二个字被感知后,被试在众多的候选词中消歧,排除了首词和目标词形式相同的可能性,从而完成双字名词的识别和判断任务。而在真词对照和语义相关条件下,首字不同就可以给被试提供足够的字形信息,让被试做出首词和目标词不同的判断,减少了识别的时间。重复条件因为首

20 同18。

21 Pykkänen, L., Stringfellow, A., & Marantz, A.: Neuromagnetic evidence for the timing of lexical activation: an MEG component sensitive to phonotactic probability but not to neighborhood density. *Brain and Language*, (81), 2002, pp.666-678.

22 Pykkänen, L., Feintuch, S., Hopkins, E., & Marantz, A.: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family frequency and family size: an MEG study. *Cognition*, (91), 2004, pp.B35-B45.

23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8-159页。

24 Coltheart, M., Curtis, B., Atkins, P., & Haller, M.: Models of reading aloud: Dual route and 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 approach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1993, pp.589-608.

25 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Langdon, R., & Ziegler, J.: DRC: 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2001, pp.204-256.

字和尾字都相同，如果按照串行方式加工，也不会发生判断前后矛盾的情形，也可以节省认知决策的时间。

(二) 基于跟踪模型对实验 A 和 B 的统一解释

然而，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识别有所不同，因为书面语言并不像口语那样需要严格在时间的一维性上展开，其可以在二维平面上进行信息处理，具有非线性属性。在阅读中，一些视觉词需要重新注视，另一些词则快速跳过，仅仅通过副中央窝感知加工²⁶。可是每种文字的非线性属性程度不同，这与每种语言的文字类型和正字法深度有着紧密的关系。正字法深度即词的形态结构与音位结构之间的一致程度²⁷。对比汉英两种文字可知，英文文字词字母和音位层的对应规律强，正字法深度低，词本身受到离散的字母排列的制约，线性编码属性强，有时词的维度拉得很长，如“pneumonoultramicroscopicsilicovolcanoconiosis”（矽肺病）“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electroencephalography”（脑电图），“dihydrostreptomycin”（二氢链霉素）“longitudinally”（纵向地）“chemiluminescence”（化合光），而方块汉字却是与音节、声调直接对应，而不是与音位对应，具有丰富的部件和层次等二维空间编码信息，正字法深度高，视觉符号信息可以帮助区分许多音节和声调均相同的字，如“成、程、乘、呈、城、诚、承、橙、澄、丞、盛、惩、埤、箴、瑛、械”等。这些字在合成音系词中如果为词的首音节，大脑无法将它们区分开来，造成识别的障碍，但是在书面语言中，它们因为形体的差异而容易得到区分，具有区别性价值²⁸，增加了文字词形识别的确定性。可以理解正字法深度会对文字词识别产生重要影响^{29,30}。研究表明读者采用语言表

26 Rayner, K.: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 1998, pp.372-422.

27 江新：《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2期，第68-74页。

28 丁或藻：《论汉语信息编码的基本结构单位“字”》，《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第65-75、84页。

29 张积家：《正字法深度与字词认知》，《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39-45页。

30 杨群、王艳、张积家：《正字法深度对汉族、维吾尔族大学生汉字词命名

面的音位策略加工正字法深度浅的文字词，而采用视觉码加工正字法深度高的文字词³¹。对于中文这种正字法深度高的文字，读者会更多地依靠视觉码去识别，语音不是语义激活的必要成分^{32,33}，尽管语音信息在汉字语义通达中具有重要作用³⁴。

然而，尽管在书面语言中汉字的形体区别度高，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用串行加工来解释所观察到的所有现象。首先，同样是词形匹配任务，实验 B 的结果显示，尾字相同条件比真词对照、语义相关和重复条件的反应时更长。这种现象就无法用线性序列识别方式加以解释了。如果大脑加工文字词是按照线性顺序从初始的字开始进行（汉语一般是左边第一个字），然后逐个向后推进，那么尾字相同条件就不应该会出现识别时间延长的情况，因为在尾字相同条件下，首词和目标词的首字读音和字形均不同。首字形体的差异就可以帮助被试确定首词和目标词在整词形式上不同，而不需要顾及尾字，从而迅速做出首词和目标词不属于同一个词的判断，反应时也不应该与真词对照和语义相关条件有显著性差异，因为各条件的首词之间在笔画数和使用频率上做到了严格的匹配。这种现象也不可能是由于语义因素的影响，因为实验 A 和 B 中语义相关条件的首词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相关度比真词对照条件的首词和目标词之间的语义相关度均显著更高，但是这两种条件在实验 A 和 B 中的反应时均没有显著差异。这就说明语义变量在词形匹配任务中对反应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综合上述分析，可以推导出：被试没有完全采用线性序列的方式加工双字名词的词形。无独有偶，

的影响》，《心理学报》，2019年第1期，第1-13页。

31 Katz, L., & Feldman, L. B.: Linguistic coding in word recogni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a deep and a shallow orthograph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9),1981, pp.157-166 .

32 孔令跃、康翠萍、穆彦丁：《汉字语义通达中语音的激活与作用》，《心理学进展》，2012年第5期，第229-235页。

33 Zhang, J. X., Xiao, Z., & Weng, X.: Neural evidence for direct meaning access from orthography in Chinese word r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84), 2012, pp.240-245.

34 Perfetti, C. A., Liu, Y., & Tan, L. H.: The lexical constituency model: Some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for general theories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 2005, pp.43-59 .

Allopenna 等人³⁵ 使用眼动跟踪的范式（即视觉世界的范式）发现，个体在被要求对一个目标词反应的时候，会更多地注视音系相关的竞争的图画。这种效应不仅在群竞争词上（如 carrot-carriage），而且在押韵词上（如 carrot-parrot）都被观察到。跟踪（TRACE）模型^{36,37} 认为词项共享其他类型近似的信息如韵、邻里等也会对识别进行竞争，如 cat: hat, bat: kit。本实验在词形匹配任务下对方块文字词的发现与跟踪模型的预测一致，反映了汉英两种不同类型语言或文字的词项识别受到了共同认知机制的制约，只是在我们的实验中共享信息操纵的变量是在中文里凸显的、作为书写单元的汉字。这也是本实验根据中文文字类型特点进行设计的创新之处。

实验 A 和 B 的结果也表明相同汉字单元无论处在词的首位还是末位均被大学生母语被试成功地切分，具有强烈的心理加工现实性，对词的识别产生竞争，影响到了词形识别的效率。汉字单元的解析是合成词识别的必要组成部分。没有单字的解析，整词形式的匹配任务将很难完成。这提示我们在汉语合成词阅读教学时需要训练学生的汉字单元分析加工能力。但是汉字单元的解析是在整词语境下发生的，即整词通过较高层次表征的回馈机制（feedback mechanism）^{38,39,40} 影响汉字单元的加工。具体地说，在词形匹配任务中，当整词只是部分相同时，被激活的相同的首字或尾字会驱动大脑发出相同的判断指令信息，而被激活的更高层的整词语境信息提示双字词中的另一个字不同，整词也不同，驱动大脑发出不同的判断指令信息。这种矛盾冲突和消解过程导致了首字相同或尾字相

35 Allopenna, P. D., Magnuson, J. S., & Tanenhaus, M. K.: Tracking the time course of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using eye movements: Evidence for continuous mapping model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 1998, pp.419-439.

36 同 2。

37 同 3。

38 McClelland, J. L., and Rumelhart, D. E.: An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f context effects in letter perception. 1. An account of basic findings. *Psychological Review*, (88), 1981, pp.375-407.

39 Lamme, V. A. F.: Why visual attention and awareness are differe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2003, pp.12-18.

40 Rousset, G. A., Thorpe, S.J., & Fabre-Thorpe, M.: How parallel is visual processing in the ventral pathwa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2004, pp.363-370.

同条件下反应时的延长。因此说汉字单元的识别一定发生于整词的框架中,无法逃逸于整词语境的制约。以往一些研究显示被试以整词的方式表征和提取词汇信息是可观察到的事实^{41,42,43}。这也提示我们汉语合成词阅读教学时也需要注意对学习者的整词形式的操练。

(三) 分析加工与整词中汉字单元的解析

分析加工(analytic processing)和整体加工(holistic processing)对单词的识别来说是两个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构成人类阅读认知能力的基础,其中分析加工对语言加工来说更为根本。对于中文阅读者来说,阅读合成词时需要将汉字串成功分解成各个组成部分。尽管中文里合成词占大多数,汉字的重要性仍不容低估。赵元任⁴⁴曾指出:“对于一般的说汉语写汉字的人来说,社会学的词,即‘字’,在语音上是一个单音节,在文字上是一个汉字”。后来的字本位理论在承认“辞”(指凝固性很强的固定字组)⁴⁵或“字结”(指不能从字和组合关系中类推出意义的言语片段,相当于“辞”,如“老师、老虎、老鹰”)⁴⁶这级单位存在的前提下,也强调了汉语中单音节“字”的凸显地位,而这与汉藏语言中音节显赫⁴⁷又存在紧密关系。在字本位理论中,“字”可以是“音系字”,如“字正腔圆”“吐字清楚”“‘你敢说一个‘不’

41 Grainger, J., & Whitney, C.: Does the huamn mnid raed wrods as a wloh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 2004, pp.58-59.

42 丁国盛、彭聃龄:《汉语逆序词识别中整词与词素的关系》,《当代语言学》,2006年第1期,第36-45页。

43 同30。

44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12年,第93页。

45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46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333页。

47 刘丹青:《汉藏语言的音节显赫及其词汇语法表征》,《民族语文》,2018年第2期,第3-21页。

字!’ ”⁴⁸，也可以是书写的文字^{49,50}。汉字是一种自源性文字，其与汉语言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认知神经科学的角度分析，因为汉语中大多数“字”是有意义的且带有音节内曲折变化的声调，当汉语使用者加工“字”特别是“音系字”时，会激活大脑中“字”的音系系统（包括声调系统）及其意义系统，使更多的神经元及其组成的脑回路处于觉醒状态，产生系统共振效应，从而使汉语中的音节具有比多音节语中的音节给人以更加凸显的心理表征，同时音节的显赫又为字化创造了条件，如“法兰西”（France为单音节，翻译成汉语成了三音节）“法国”“法语”“法军”“法币”“法式”“法皇”“中法”。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实验也显示听取可理解话语时，汉英语言激活的神经回路显示出较大差异，汉语母语者大脑中的R节点（右脑前颞叶）有额外的激活，而R区在功能上与音高及声调的加工相关；此外汉语所特有的R节点和P节点（左脑颞上回后部）之间的双向联结以及从R节点到F节点（左脑额下回）的单向联结被可理解话语所调节⁵¹。从大脑加工语言的动态和系统角度看，对“字”的理解跳出书写的文字的局限性是必要的。“音系字”具有音节的离散性，实现为正字法界面上作为书写单元的文字时具有视觉上的离散性，字然后组合成更多的词、短语和无限多的句子，体现出人类语言“离散的无限性”（discrete infinity）^{52,53}。语言的“离散的无限性”几百年来一直为伽利略、笛卡尔、洪堡特、乔姆斯基等一批具有独立思考品质和创新精神的学者们所注意和思考。从太阳、地球、月亮到生物个体、细胞、染

48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12年，第78-79页。

49 同45，第126页。

50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

51 Ge, J.Q., Peng, G., Lyu, B.J., Wang, Y., Zhuo, Y., Niu, Z.D., Tan, L.H., Leff, A.P. & Gao, J. H.: Cross-language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 network subserving intelligible spee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 2015, pp.2972-2977.

52 Hauser, M., N. Chomsky & Fitch. W. T.: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Science*, (298), 2002, pp.1569-1579.

53 诺姆·乔姆斯基：《如何看待今天的生物语言学方案》，司富珍译，《语言科学》，2010年第2期，第113-123页。

色体、基因，再到分子、原子、质子、中子、电子。这些自然客体无不具有离散的特征。“量子”也具有离散的属性，指能表现出某物质或物理量特性的最小单元，如“光子”。人类语言所具有的“离散的无限性”客观上要求大脑演化出强大的专司分析加工的神经回路对其进行识别，解析出可“量子化”的离散单位。然而，正如乔姆斯基⁵⁴所指出的，基本原子成分（有点类似于词，但不是词）包含了种种深邃的奥秘，与动物的交际系统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其起源还是完全模糊不清的，它为人类认知能力进化特别是语言能力进化的研究提出了十分严肃的问题。从共时的角度看，对于汉语书面语言，我们必须辨析出汉字这一级离散单位来区分不同的合成词。解析出汉字单元是成功阅读中文词汇的关键一环，而解析出单个的字母却是英文单词阅读的必要一步。区分分析加工和整体加工能力对文字词的识别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现在的研究进展显示一般情况下分析加工与左半球有关，而整体加工加工与右半球有关，具有侧化效应，涉及到差异化的大脑回路，反映出人类大脑进化出了专门化的认知能力来分析物体和语言的组成结构。例如，在学习过程中相对于在整词注意下训练的词，对字素-音位投射的选择性注意能够驱动大脑回路的左侧化，包括引发 N170 的左侧化地形⁵⁵。英语母语者学习汉语词时，随着训练，只有快速学习者显示出 N170 波幅的左侧化增长，因此说快速学习者使用了更多结构的表征（structural representation），而慢速学习者更多使用了整体表征（holistic representation）⁵⁶。失读症和面孔失认症的表征缺陷就分别与分析加工和整体加工能力的缺失有关⁵⁷。失读症患者可以认出朋友写的手写稿，却无法读出单词，而面孔失认症患者可以读出单词，却辨认不出这是谁的笔迹。究其原因就在于读出英

54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结构体系及其对进化的重要性》，司富珍译，《语言科学》，2018年第3期，第225-234页。

55 Yoncheva, Y. N., Wise, J., & McCandliss, B.: 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 for graphic words is shaped by attention to sublexical units during initial learning. *Brain and Language*, (145), 2015, pp.23-33.

56 Yum, Y. N., Midgley, K. J., Holcomb, P. J., & Grainger, J.: An ERP study on initial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Psychophysiology*, (51), 2014, pp.364-373.

57 Rentschler, I., Treutwein, B., & Landis, T.: Dissocia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processing in visual agnosia. *Vision Research*, (34), 1994, pp.963-971.

文的单词依赖于解析出单个字母的形状，而辨认一个人的独特笔迹风格却依赖于字母串的整体形式。中文合成词识别需要依赖于单个汉字形状的分析加工，本实验为这一假设提供了确凿的实证数据，也是对乔姆斯基之问所做的一次探索。

(四) 合成词的识别模型

关于汉语合成词识别存在几个主要模型。Zhou 和 Marslen-Wilson⁵⁸ 关于汉语复合词的音、形、义互动激活模型认为在正字法和音系中，双字词是以两个分离的知觉单元相结合表征的，不存在单独的整词表征单元。Tan 和 Perfetti⁵⁹ 的汉语双字识别模型认为在正字法上汉字单元和整词单元是在同一个水平上表征的。丁国盛和彭聘龄⁶⁰ 提出的扩展的 IIC 模型包括三种水平的表征：正字法表征、通达表征和语义表征。汉语复合词正字法表征保存着复合词的视知觉特性，其基本单元是汉字。通达表征层是正字法表征和语义表征的中介。本实验选择的被试均是以汉语为母语的大学生。实验结果显示他们经过多年的中文阅读训练，展现出显著的汉字单元（包括首字和尾字）分解表征能力，也呈现出良好的整词表征能力，且在合成词识别中汉字单元表征与整词单元表征的激活相互作用，高效地完成了词形匹配任务。因而说双字名词既存在两个分离的汉字单元表征，又存在单独的整词表征，且整词表征高于汉字单元表征，具有形式的层级性。无论是汉字单元还是整词单元都具有抽象的表征层，即扩展的 IIC（层间—层内联结）模型所谓的通达层，不会受到颜色、字体、大小、笔迹这些整体风格的影响。本实验发现大学生母语者已经具备成熟的汉字单元切分能力，但是这种内在的文字认知能力的发展路径和规律是怎样的，至今还是不太清楚。在此提出这个有趣的科学问题，供有兴趣的读者做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探索乔姆斯基之问关于语言基本原子成分及其认知能力的起源奥秘。

58 Zhou, X. L., & Marslen-Wilson, W.: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compound words: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Psychologia*, (43), 2000, pp.47-66 .

59 Tan, L. H., & Perfetti, C. A.: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visual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two-character word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 1999, pp.382-393.

60 同 42。

五、结论

(1) 汉语大学生母语者不是以完全线性序列的方式加工双字名词,首字或尾字相同会对合成词识别产生竞争,符合跟踪模型的预测。

(2) 汉语大学生母语者同时具有显著的汉字单元分解表征和整词表征能力,且合成词识别中汉字单元表征与整词表征的激活相互作用。这些发现为中文合成词阅读教学中汉字单元和整词形式均需重视提供了心理学依据。

参考文献

1. 陈保亚:《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2. 丁国盛、彭聃龄:《汉语逆序词识别中整词与词素的关系》,《当代语言学》,2006年第1期。
3. 丁彧藻:《论汉语信息编码的基本结构单位“字”》,《华文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3期。
4. 江新:《外国学生形声字表音线索意识的实验研究》,《世界汉语教学》,2001年第2期。
5. 孔令跃、康翠萍、穆彦丁:《汉字语义通达中语音的激活与作用》,《心理学进展》,2012年第5期。
6. 刘丹青:《汉藏语言的音节显赫及其词汇语法表征》,《民族语文》,2018年第2期。
7. 诺姆·乔姆斯基:《如何看待今天的生物语言学方案》,司富珍译,《语言科学》,2010年第2期。
8. 诺姆·乔姆斯基:《语言结构体系及其对进化的重要性》,司富珍译,《语言科学》,2018年第3期。
9. 徐通锵:《语言论——语义型语言的结构原理和研究方法》,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10. 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年。
11. 王洪君:《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12. 王丽红: 《中文阅读知觉广度的眼动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1年。
13. 闫国利、王丽红、巫金根、白学军: 《不同年级学生阅读知觉广度及预视效益的眼动研究》, 《心理学报》, 2011年第43期。
14. 杨群、王艳、张积家: 《正字法深度对汉族、维吾尔族大学生汉字词命名的影响》, 《心理学报》, 2019年第1期。
15. 张积家: 《正字法深度与字词认知》,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年第1期。
16. 张兰兰: 《汉语阅读过程中心理词加工机制的实验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天津: 天津师范大学, 2012年。
17. 张学新、方卓、杜英春、孔令跃、张钦、邢强: 《顶中区 N200: 一个中文视觉词汇识别特有的脑电反应》, 《科学通报》, 2012年第5期。
18. 赵元任: 《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2012年。
19. 周荐: 《双字组合与词典收条》, 《中国语文》, 1999年第4期。
20. Allopenna, P. D., Magnuson, J. S., & Tanenhaus, M. K.: Tracking the time course of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using eye movements: Evidence for continuous mapping models.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4), 1998.
21. Coltheart, M., Curtis, B., Atkins, P., & Haller, M.: Models of reading aloud: Dual route and parallel-distributed-processing approach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00), 1993.
22. Coltheart, M., Rastle, K., Perry, C., Langdon, R., & Ziegler, J.: DRC: a dual route cascaded model of visual word recognition and reading aloud. *Psychological Review*, (108), 2001.
23. Ge, J.Q., Peng, G., Lyu, B.J., Wang, Y., Zhuo, Y., Niu, Z.D., Tan, L.H., Leff, A.P. & Gao, J. H.: Cross-language differences in the brain network subserving intelligible speech.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0), 2015.
24. Grainger, J., & Whitney, C.: Does the huamn mnid raed wrods as a wloh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2), 2004.
25. Hauser, M., N. Chomsky & Fitch. W. T.: The faculty of language: what is it, who has it, and how did it evolve?. *Science*, (298), 2002.
26. Huang, X., Yang, J., Chang, R. & Guo, C.: Task modulation of disyllabic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in Mandarin Chinese: a unimodal ERP study.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27. Inhoff, A. W., & Liu, W.: The perceptual span and oculomotor activity during the reading of Chinese sentenc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4), 1998.
28. Katz, L., & Feldman, L. B.: Linguistic coding in word recogni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a deep and a shallow orthograph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9), 1981.
29. Lamme, V. A. F.: Why visual attention and awareness are different.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7), 2003.
30. Li, X. S., Rayner, K., & Cave, K. R.: On the segmentation of Chinese words during reading. *Cognitive Psychology*, (58), 2009.
31. Libben, G.: How is morphological decomposition achieved? *Language & Cognitive Processes*, (9), 1994.
32. Marslen-Wilson, W., & Tyler, L. K.: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spoke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Cognition*, (8), 1980.
33. McClelland, J. L., and Rumelhart, D. E.: An interactive activation model of context effects in letter perception. 1. An account of basic findings. *Psychological Review*, (88), 1981.
34. McClelland, J. L., & Elman, J. L.: The TRACE model of speech perception. *Cognitive Psychology*, (18), 1986.
35. Norris, D., & McQueen, J. M.: Shortlist B: A Bayesian model of continuous speech recogni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2), 2008.
36. Perfetti, C. A., Liu, Y., & Tan, L. H.: The lexical constituency model: Some implications of research on Chinese for general theories of read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 2005.
37. Pykkänen, L., Stringfellow, A., & Marantz, A.: Neuromagnetic evidence for the timing of lexical activation: an MEG component sensitive to phonotactic probability but not to neighborhood density. *Brain and Language*, (81), 2002.
38. Pykkänen, L., Feintuch, S., Hopkins, E., & Marantz, A.: Neural correlates of th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family frequency and family size: an MEG study. *Cognition*, (91), 2004.
39. Rayner, K.: Eye movements in reading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20 years of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3), 1998.
40. Rentschler, I., Treutwein, B., & Landis, T.: Dissociation of local and global processing in visual agnosia. *Vision Research*, (34), 1994.
41. Rousselet, G. A., Thorpe, S.J., & Fabre-Thorpe, M.: How parallel is visual processing in the ventral pathway?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8), 2004.

42.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1972/2001.
43. Selfridge, O. G.: Pandemonium: A Paradigm for learning. In *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on the mechanization of thought process*.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1995.
44. Tan, L. H., & Perfetti, C. A.: Phonological activation in visual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two-character word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25), 1999.
45. Tydgat, I. & Grainger, J.: Serial position effects in the identification of letters, symbols, and digi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2), 2009.
46. Yoncheva, Y. N., Wise, J., & McCandliss, B.: Hemispheric specialization for graphic words is shaped by attention to sublexical units during initial learning. *Brain and Language*, (145), 2015.
47. Yum, Y. N., Midgley, K. J., Holcomb, P. J., & Grainger, J.: An ERP study on initial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learning. *Psychophysiology*, (51), 2014.
48. Zhang, J. X., Xiao, Z., & Weng, X.: Neural evidence for direct meaning access from orthography in Chinese word rea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physiology*, (84), 2012.
49. Zhou, X. L., & Marslen-Wilson, W.: Lexical representation of compound words: Cross-linguistic evidence. *Psychologia*, (43), 2000.

华南宗乡文化在海外 ——曾玲《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书评

The Southern China Clan Culture Outside the Mainland: A Book Review on Zeng Ling's "A Study of Chinese Clan Culture in Singapore"

廖文辉

Lew Bon Hoi

作者：廖文辉，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中文系及东南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海外华人和东南亚史。邮箱：bonhoi.lew@gmail.com

《新加坡华人宗乡文化研究》一书可谓是曾玲老师《越洋再建家园：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之后另一部研究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的力作。曾老师曾于1994年至2001年在新加坡生活和教研工作了七年，极为深入了解和体悟华人在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国度的生存情况，往往在字里行间透现其对华人的同情了解。近来她更将其研究外延扩展至马来西亚华人社会，在书中可以看到一些她的接触和初步的观点，期待往后她在这方面的成果。

本书凡五卷，共四十余万言，内容皆围绕在新加坡华人的宗乡社团和文化，卷一第二部分可视为作者对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加坡华人总乡社团和文化发展的鸟瞰，卷二和三则分别探讨新加坡华人的坟山、庙宇和节庆之宗乡团体和文化。卷四则是作者近年以其新加坡的研究经验，开始拓展其研究范围至东南亚，主要是集中在马来西亚的尝试。附录的部分则是与本书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序文和书评的汇集。

本书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在史料应用方面，极为注重民间历史文献的使用，书中不少论述和观点都借助于碑铭资料、社团会议记录、账本和纪念刊等文献。在传统文献几近穷尽的马新华人

研究，大量的文献仍然静躺在民间，有待识者发掘，这些资料无法仅凭固守书斋获得，有赖进入田野亲身访察。以庶民为主导的马新华人历史，许多的史实不在官方的记载范围，例如华人家族中的童养媳、赘婿、螟蛉子等习俗。¹ 这些空白无法通过官方档案和文献来填补，只有向下寻找才有可能较为如实完整地构建庶民的华人社会历史。

传统文献向为马新华人研究的主要采用史料，但随着传统史料的穷尽，民间历史文献逐渐受到关注，一场史料革命已经悄然兴起。尤其是在华人村镇和民俗研究方面，传统史料已经无法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面貌，反而民间文献方能有以为之，传统史料退居二线，成为辅助史料，成为佐证的角色。其次，不少已经开发的议题，只有在民间文献的助力下，方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社团特刊原是民间文献，是马新华人研究长期被使用的史料，其实社团特刊已经化身为传统史料，随着研究的深化，已不足承担新领域和细致的史料功能。可以预见，许多马新华人研究的课题，以民间文献为主，传统史料为辅的史料使用模式，将会到来。

第二是其切入的视角。本书给学界最大的启发是作者所揭示的两个与别不同的切入视角，即移民与文化移植，以及华夏文明体系与中华文化海外发展关系的视角。马新的华人研究不在国家学术发展的主流，这表现在政治位置的边缘，也显示在语文的非官方地位。21世纪以前，除了少数学者，我们其实更依赖西方、中国和台湾学者的成果，如傅吾康、陈铁帆、李亦园、柯雪润（Sharon A. Carstens）等，即便颜清湟和杨进发虽然是马来西亚土生，但最后远走他国，已非马新学者。早期东南亚华侨华人研究经历了通过海外华人社会来了解中国社会，乃至想当然尔在不甚了然东南亚国情的情况下以中华帝国的角度来审视华人社会。这种情况随着中台学者较为频密进入东南亚并居留进行科研，加上在地学界逐渐成熟，在相互碰触交流的过程中，上述的情况已基本剔除，作者的著述可谓是极具代表性的成果。曾玲老师对新加坡华人社会研究的两个视角，兼具在地关怀和中华文化传播的内涵，或许这是当下东南亚华

1 1892年吡叻的代理政务司曾指令境内的县长承认有关华人的婚嫁、纳妾、收养子女和财产继承等传统习俗。颜清湟著，海外华人的社会变革与商业成长，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12

人社会研究的取径。这也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研究经历了前期的从岸外战舰甲板观望陆地，到现今从岸上城堡望向海洋的发展。

这里或许可以马来西亚血缘组织为例作一说明。血缘组织的研究相较于地缘、业缘、神缘和文教团体而言，是目前马新华人研究最为薄弱的一环。除了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和石沧金《马来西亚华人社团研究》做通论式的论述，以及李丰懋《从圣教到道教：马华社会的节俗、信仰与文化》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其他为数甚少的论文研究成果，其实无法形成学术积累，深入和全面的研究实际上还远未开展。其主要原因是血缘组织是以家族或宗亲群体为凝聚对象，社团作风较为封闭，向外发挥影响力并非这些组织的主要作用，其主要功能在照顾自我家族和宗亲的福利。这种内卷的特色，使其政治和社会关注无疑难以和地缘和业缘等社团相比，其研究成果自然寥落。中国华南地区宗族组织强大，宗祠遍布，华民在移入时也将之带进马新，然而国情的差异，不论在观念、形式和运作等方面，自然无法原封不动移植。如果仍然以研究中国宗族组织的观点和方法来审查马新的宗亲团体，难免格格不入，无法确实掌握其内涵。以马六甲为例，许多宗祠都是不分籍贯及血缘的，只要同姓就可参与，纯粹以同姓为连接和认同依据。其次，在运作上有社团化的倾向。在马来西亚，确切而言，血缘组织更多是以社团的方式组成，他们必须在社团注册局名下注册，方始为一合法运作的团体。他们以西方议会民主制进行领导，不再采行宗法级别的领导方式。这可以从春秋两祭和墓祭的主祭人选知其端倪。如黄氏家族会即通过议会民主方式遴选会长，由其统领会中事务，包括负责主祭事宜，为其显例。华南的宗祠在地后，因应在地情况，放弃了一些宗祠的原则，更为靠近社团，只能以宗亲会目之。

人类赢了吗？ ——马凯硕《中国赢了吗？》书评

Did Humankind Win the battle? A Book Review on
Kishore Mahbubani's "Has China Won?"

林德顺
Ling Tek Soon

作者：林德顺，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高级讲师，研究兴趣：马中关系和当代中国政治。邮箱：lingteksoon@um.edu.my

《中国赢了吗？——中国对美国至上的挑战》（Has China Won? - The Chinese Challenge to American Primacy）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本年度新作。承接前作《亚洲人会思考吗？》和《西方输了吗？》等的思维，马氏再度重申中国的崛起，以现时中美地缘政治竞赛为讨论点，极力劝阻美国在“修昔底德陷阱”前悬崖勒马。

本书厚320页，共有九个章节，由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Public Affair）于今年三月出版。书中作者认为美国人多以为目前的中美竞争本质如他们的领袖所描述，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与中共的共产集权制度之争，而其实这是个误读。更准确的说，这样的看法是冷战时代的看法，放在当今时代显然过时了。反之，当年冷战打败苏联的美国民主也已经堕落，它已经沦为财阀主导的政治，因此特朗普才能以打倒华尔街代理人的口号受到选民青睐中选，因为美国政治受财阀操纵的迹象昭彰。现今的中共却建立一套贤能政治制度，在习近平治下，反贪腐雷厉风行，在宏观上的国家治理比以往更有效率。因此这一次双方较劲，作者断言最终将由奉行贤能政治的一方取胜。他不讳言目前中美在地缘政治方面正处于一种“竞赛”（contest）的状态。自冷战后成为世界单

极大的美国近年来面对中国崛起，正面挑战的就是美国作为全球领先的大国地位。他引述基辛格在 2018 年跟他说的一句话：“美国正在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它在中国展开竞赛，而事先却没有制定与中国打交道的全面和全球战略。”换句话说，美国政府为了击败中国，选择了与中国展开一场政治和经济上的零和地缘政治竞赛。但他们混乱开打而又不协调的对华贸易战，间接上使美国和中国经济脱钩。有鉴于当今中国与国际贸易联系程度，反过来更很可能导致美国与世界脱钩。因此作者认为这是美方没有理性的理解和权衡战略方向选定所引致的后果。

马凯硕的言论向来支持中国和平崛起，认为中国的繁荣能为世界带来正面好处。他也提到中国本身的问题是至今仍抱持“天朝上国”的思维，没有主动促进世界公平和开放的经济接触。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官员普遍上把美国视为一个堕落的巨人，而忽视了她可能在经济上卷土重来的潜力，这无疑是一种傲慢。对于中国崛起所引发世界强国格局的变动，他倾向于各国在现有的国际组织框架里向中国协商施压，而不是通过如目前中美贸易战或者是在南海军舰对峙的方式进行威吓谈判。他在书中也提到这样的形势不止是让中国和受贸易战及南海海域国家承受压力以外，对美国本身，尤其是普罗百姓也一样没有好处。如上文所提及，现今美国政治已经是财阀政治的境况。美国在特朗普治下通过疏远盟友并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反而使中国受益，却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地位。另外，自 2001 年以来，美国在中东发动的军事行动中浪费了将近 5 万亿美元，导致美国社会中的资本弱势群体生活水平大大落后。马氏认为美国政府可以通过与中国合作提升商贸同时把军事冲突所耗费的国家资源挹注在这些弱势群体上。

纵观全书，可发现作者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在论证“中国赢了吗？”这个命题。他更在意的是希望两国在关键的全球问题上进行具体合作。他特别点名了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创造有利的全球贸易环境方面。以中国当今建成数万里铁路公路的成绩，她当然有能力帮助建设美国的基础设施，为美国的经济带来更大的提升。通过相互追求和平与繁荣的过程中，两者可以努力实现“文明融合”而不是冲突。他总结说，世界其他地区的 60 亿人口期望美国和中国“致力于拯救地球并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因此，最后的问题将不是美国或中国是否获胜，而是人类是否赢了。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来稿须知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是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办的当代综合性学术期刊。本刊范围涵盖一切与当代中国有关的研究课题，学术领域不限。本刊格式：

1. 文稿一律采用中文简体，以 MS Word 编辑，中文字体为“宋体”，英文字体为“Times New Roman”，独段引言用“楷体”，采用 12 号字，1.5 倍行距，页码置于页尾右侧。

2. 文稿顺序：中英文篇名、摘要、关键词、作者简介（中文为先）、正文、参考文献。

3. 篇名：简明、确切地概括论文最重要的特定内容，一般不超过 20 字，必要时可以加副篇名。避免使用非公知公用的缩略语、字符、代号和公式。英文篇名与中文篇名含义一致。

4. 作者简介：姓名、职称、工作单位、研究方向或者研究兴趣和邮箱。

5. 摘要：客观地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不超过 300 字，不分段，不用图表和非公知公用的符号或术语，不引用图、表、公式和参考文献的序号。英文摘要的内容与中文摘要相对应。

6. 关键词：反映论文的主题概念，一般标注 3 - 8 个，用分号隔开。英文关键词与中文关键词一一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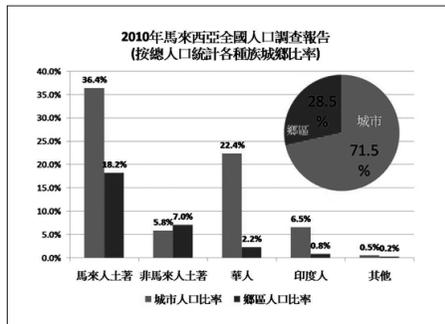
7. 标题：大小标题以一，（一），1，（1），（i）为序。

8. 脚注：是对引文出处或用于对文章篇名、作者及文内某一特定内容作必要的解释或说明。采用1序号，通篇序号连贯，若脚注针对文中某特定词语，序号置于该词语右上角，脚注内容位于插入页正文下方。体例如下：

1.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262页。
2.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年第111期，第103-113页。
3.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第9-19页。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p.168.

9. 图表：文内所有的图表皆以序号标明及排列，如：图1、图2、表1、表2。序号后应备注该图表的相应标题（如有），资料来源置于图表的下方。如：

表1 2010年马来西亚全国人口调查报告



资料来源：政府人口普查报告 / 作者制表

10. 参考文献：列于正文之后，中英文参考文献分开排列，中文在前，英文随后，采用作者姓氏字母顺序。如：

1. 黄锦树：《族群关系·敌我》，黄锦树、王德威编：《原乡人：族群的故事》，台北：麦田，2004年。

2. 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 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年。
3. 西西：《巴加斯·略萨作品的时空浓缩结构——试析《潘特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第一章》，《联合文学》，1994 年第 111 期。
4. Voltaire: *Candidate and Zadig*. New York: 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 1966.

11. 网络资料：作者：《资料名称》，《网站刊物名称》，资料发表日期。网址。取用日期，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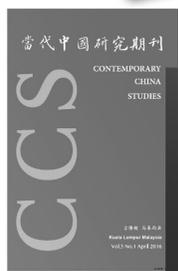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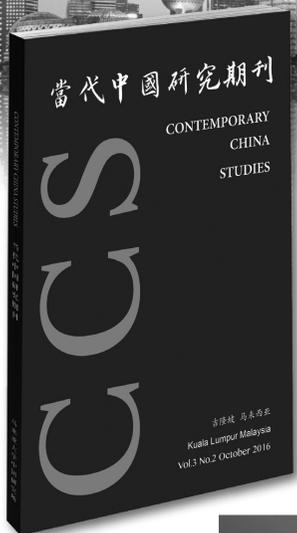
张铁：《人民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人民网》，2011 年 12 月 22 日。网址：<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6677909.html>。取用日期：2017 年 5 月 13 日。

12. 联系方式：包括能够与作者及时沟通的电子信箱和电话。

竭诚欢迎广大新老学者踊跃投稿。

本刊编辑部电子信箱：ccs2014ics@gmail.com

地址：《当代中国研究期刊》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



《当代中国研究期刊》(ISSN 2289-7534)是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出版的两份学术刊物之一,也是马来西亚唯一一本以中文为媒介语,深度剖析当代中国的学术期刊。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是马来西亚唯一一个专门从事中国问题研究的学术机构和政府智库。本所成立于 2003 年,由当时的马来西亚首相阿都拉提议创办,旨在成为马来西亚以及东南亚地区从事中国研究的领军机构,并成为沟通全球关注中国的学者、企业家、政府官员的重要桥梁。中国研究所定期出版两份期刊:英文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为 Scopus 所收录;中文期刊就是本刊——《当代中国研究期刊》(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本刊自出版以来已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刊物,尤其在海外华人学术界。刊内所收录的文章内容广泛,涵盖与当代中国相关的各个领域,投稿学者来自东南亚、中国以及港澳台地区。本刊坚持以努力追求学术创新、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的理念选取当代热门的中国研究文章,并以专业严谨的态度出版,获得学术界一致好评。本刊现向诸位学术同好邀约撰写稿件,任何与当代中国相关的论文课题,一概欢迎。本刊将继续努力成为海外当代中国研究的中文学术交流平台及展示中文学术文化的窗口。



UNIVERSITY OF MALAYA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

邮箱: ccs2014ics@gmail.com

电话: 603-7967 7288

地址: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Malaysia.